

宋王臺文化景觀與香港的歷史記憶流變¹

韓子奇 陳學然*

一、空間與記憶：從「宋王臺石刻」到「宋皇臺公園」

景觀 (landscape) 不同於地標 (landmark)，它不單是某個地方的建築物或景物，同時也是一個擁有一段獨特歷史、文化意涵的空間 (space)，是建立集體記憶的媒介與群體意識的符號。儘管我們可以在景觀一詞前面加上歷史、文化、文學等不同的前綴名詞，以凸顯景觀的深層空間涵意，但無可否認，景觀之所以被稱為「景觀」，它本身就是一個符號系統，不只是實在的一棟建築物或一個自然景物。當然，一個景觀，也同時可以作為一個地標。但地標不足以構成一個具備特殊的、擁有深層意義的景觀。景觀這樣的一個文化空間，它是多面相及多維度的。它既可以

* 韓子奇，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歷史文化中心教授
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¹ 筆者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先生細緻、中肯與富建設性的評審意見！本文撰寫，獲得以下機構的經費資助，筆者一併致謝：

I. 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計劃——「嶺南文化與世界：廣東文人文化景觀的建構及轉變 (1821–1949)」(C4006-22GF)。

II. Lord Wilson Heritage Fund,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The Construction of Sung Wong Toi Garden in Cold War Hong Kong.”

III. 廣東省 2021 衝補強「專項項目：傳播粵港澳大灣區」(UICR00028-21)。

(筆者按：本文輪番交替使用「宋王臺」與「宋皇臺」二詞，前者是專指宋元石刻〔即那塊刻有「宋王臺」三字的巨石〕，而「宋皇臺」則是特指 1950 年代以來，簡又文編撰《宋皇臺紀念集》、圍繞香港政府建造「宋皇臺公園」的文化景觀。本文的標題用了「宋王臺」特指那塊石刻本身及其近乎千年的流變史。即使是「宋皇臺公園」，主角仍是那塊刻有「宋王臺」三個大字的巨石。不過，歷來不少人書寫「宋臺」時，也常有混雜使用「宋王臺」、「宋皇臺」、「宋皇台」或「宋王台」的情況，本文引用時將據有關文本直接引述，不擬對引文另作更動。)

指涉為一個具體的物質性的東西 (material objects)，也可以指一些抽象的符號或象徵性的觀念。空間一旦作為一種符號、象徵或價值觀念時，就可以與時俱進、隨世事而變地跨越時空限制，能夠隨時隨地喚起人們的感情，激發人們的想像力，並且塑造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使人們不知不覺地跟隨著景觀符號的指示去分配時間、調動資源、計劃將來。某些時候，同被稱作為「空間」的建築物或景物，其實包含着二律背反的意義。一方面它會把人們攏聚在一起，例如會議中心、體育場館、大型廣場；另一方面它會把人們分隔開來，比如國界、前線、和社群聚居地。

職是之故，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的空間理論讓我們認識到，「空間」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實物，而是一種不斷變化、恆常流動的過程。對列斐伏爾而言，「空間」至少包括了三個層面的意涵：感知 (perceived)、構想 (conceived) 和活化 (lived)。²「感知空間」是我們肉眼所能觀察到的事物，是實實在在的建築物或景物。「構想空間」則是通過連串思想活動而「產生」(produced) 的文化符號，而這些文化符號能夠把人們的情緒或內心憧憬召引到特定的建築物或景物，把那些建築物或景物改變為令人神往的標籤。「活化空間」(lived space) 是指可供人們賴以進行日常儀式、典禮等活動的地方，進而呈現各式各樣的文化意涵，甚至是生產新的歷史記憶或者是用文學的筆觸新創出文學記憶。「活化空間」是由「感知空間」、「構想空間」共構、融合而得出的空間，使人們在這個具有深層歷史符號及文化象徵意義的空間中，展開他們帶有特定意圖與目的的各種政治、文化及社群活動。這個被用以實現既定目的的空間，也會在不同時期受到「空間的生產者」因應社會、時局的變化而不斷地營構；空間的塑造者們，不但會有同一個時代的橫向差異，也會有縱向的異代差別，絕非鐵板一塊。

總之，「空間」是動態的、流動的和多面相的，它總是隨著時局的變化而變化，並且有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參與「空間」的塑造，賦予其不同的精神價值。這些參與者，本身便是來自四方八面、帶有形形色色的思想關懷的人。他們在大時代的推動下，不斷改變和活化既有的文化意涵和回憶系統，推陳出新，繼往開來。

² 具體理論參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 229–91. 另參 Chris Butler, *Henri Lefebvre: Spatial Politics, Everyday Lif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37–54; Lukasz Stanek,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pp. 81–132.

位於九龍灣畔的「宋王臺石刻」和「宋皇臺公園」，便是歷經多層面的「空間」塑造而產生的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它是以舊日聖山山上的「宋王臺」巨石為基礎演變而成的，被賦予了政治、文化的正統性意義與象徵符號。「宋王臺石刻」文化景觀的出現，可追溯至1915年香港富商李瑞琴(1870–1953)斥資興建石垣及牌樓開始。他把一片荒蕪巨石改變為迄立於聖山之巔的崇拜聖地；前清遺老也在此基礎上相繼出版《宋臺秋唱》(1917)、《宋臺集》(1920)等大量詩詞創作，逐漸把「宋王臺石刻」建立為緬懷清朝、寄望復辟、重整江山的文化符號。³四十年後，當韓戰禁運、國共炮戰、冷戰升溫之際，前清遺老的憂時感國、守護正統的悲烈抗爭精神，得以重新活化，成為「宋皇臺公園」回憶系統的組成部分，引領港人面對冷戰二元對立的嚴峻局面。

從「宋王臺石刻」轉變到「宋皇臺公園」的過程中，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人工建設及文化創造，「宋王臺石刻」所依附的自然物質只是粗曠簡陋地橫亙山上的一塊巨石，毫無文化意涵及莊嚴的意味。它只是一個「感知空間」，不是一個「構想空間」，更不是一個可供進行儀式、典禮以至各種形塑集體記憶的「活化空間」。當前清遺老藉李瑞琴的幫助，在「宋王臺」巨石周圍建起石垣及牌樓後，「宋王臺」巨石就變為富有歷史意涵和文化意義的「宋王臺石刻」，「感知空間」馬上變為「構想空間」。在數次「宋臺秋唱」活動裡，前清遺老把「構想空間」再改變為「活化空間」，活靈活現地把「宋王臺」的歷史和文化含義呈現人前。到了1950年代，那個已被日本軍隊炸毀的「宋王臺石刻」經過重重工序轉化為「宋皇臺公園」，這是香港政府隔代重構「感知空間」、「構想空間」與「活化空間」的一個過程。一方面，香港政府與趙族宗親總會合力把「宋王臺石刻」切割、打磨，豎立在新公園裡，接著演繹「宋皇臺」的歷史故事，使之進一步經典化，並透過各種活動再現集體記憶的場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與趙族宗親總會對宋皇臺的修繕構建也讓景觀遊覽與史事敘述更加大眾化、普及化，對普通人而言也成為一個耳熟能詳的遊覽景觀以及具代表性的地標。這樣，「宋王臺」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只是區區一塊石頭，卻足以盛載起不同年代、不同群體的集體記憶，成為香港在地化公認的、名符其實的文化景觀。⁴

³ 根據學者的研究，輯入《宋臺秋唱》、《宋臺集》的詩文作品數量頗豐，單就古詩便有193首。「宋王臺」成為了民初香港文人在人生境遇、歷史遺蹟、流亡意識、民族關懷等等相互交雜的集體記憶所繫之處。參鄒穎文編：《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

⁴ 香港很少有一個文化景觀好像「宋王臺」/「宋皇臺」那樣深受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人〔下轉頁124〕

從今天回溯歷史，一方面我們可以看見在1930年代前清遺老與國共兩黨人士在「宋王臺」面前發憤以抒情，標舉「宋王臺」的愛國禦侮的大旗表達抗日救國的思想。到了1950年代，已經被日軍破壞的「宋王臺石刻」，因應時變而在景觀上發生了全新的變化。接下來，我們很有需要重新檢視這個變化的歷史進程及其透顯的深層情志內涵。

在戰後的環球冷戰局勢挑戰下，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裡展開啟德機場的擴建計劃而夷平石刻所在的聖山。在香港淪陷期間，石刻所屬的石體已被日軍炸毀，唯獨刻有「宋王臺」三字的周邊石體仍未損壞，港府新建「宋皇臺公園」後，便把石刻安置其內。因此，遺老以忠臣死節、憂時感國為中心的宋王臺記憶系統，不但沒有斷絕，反而在1950年代得到異代相承。同時，因為新建造的公園在命名上採用了「宋皇臺」，而非石刻所示的「宋王臺」，代表了港府在制度上把「王」升格為「皇」，這一舉動讓遺老守護正統的思想，獲得了文化景觀所在地的政權認可，並且讓遺老高舉的維護正統的思想得到傳承。這一「正名」的行動，正如後續將會論述的，它有助於喚醒人們關於宋末君臣流亡過程中各種以死抗爭、維護正統的歷史記憶，讓各種圍繞「宋皇臺」的紀念碑、紀念文集的製作都別具象徵意義，使誓死禦外的道德勇氣以及敢於犧牲的民族精神得到延續與強化。

要之，近代不同時期的居港文人雅士對宋王臺進行的文學書寫、藝術描摹、參觀拜謁以至吟唱雅集，讓本身僅是記述一個千年前的末代皇帝蒼茫逃難的淒慘悲壯故事，轉變為一段維護政治、文化合法性及正統性的英勇抗爭故事。然而，合法性、正統性的闡釋，有其巨大的留白空間。不同時期不同背景的人，他們在所處時代及因應自身的政治文化信念，都可以在宋王臺的歷史故事中書寫出新的時代內涵。人們一方面可以藉宋臺遺蹟抒發匡時濟世、褒揚忠節、憂時感國、去國懷鄉、黍離之悲、弔古傷今為主調的情志，也可將與時俱進地產生批判、抗衡甚至誓死反抗到底的涵意賦予宋臺，這是因為宋末君臣逃亡到最後一刻共赴國難的壯烈行為，以及遺民誓死不事新朝的忠義，已被昇華為一種行動的指標與精神符號。故此，不同時期憑弔宋臺或出席紀念活動的人，都可能各因政治背景以

〔上接頁123〕

群所紀念、所敘述、所書寫。這點或可以方寬烈編輯的《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為例，共有127首詩詞是以宋王臺為題，數量之多，沒有其他景觀可出其右。這表露宋王臺在不同年代都成為一個可以共享的歷史記憶場域、一個可以共建的文化活動空間，也是一個可以相互明瞭而借用的精神符號，由此而表達心中的複雜情志。參方寬烈編：《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及記憶意圖各異，各借宋臺之酒以澆心中的塊壘，透過宋臺的活現空間各言其志、各行其是。因此，在1911年以來的民初時期，紀念者可能是反抗民國新政的前清遺民；⁵1950年代以流亡者自居的親國民黨政權的紀念者，則以之抵禦新朝、復以守護文化及政治正統為其職志。

不論時代如何轉變，又或者是紀念者的身份如何轉換，宋臺石刻作為維護忠臣節義、恪守正統的標誌性符號都得到一脈相承的強調。從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新思潮傳播、國共內戰以至抗日救國的大半個世紀裡，圍繞宋臺的詩詞創作與紀念活動從未停歇。因此，宋臺古蹟成為不同時期擁有相同「記憶意願」與「記憶意圖」的文人雅士的「記憶所繫之處」。⁶藉着持續性的文學書寫、雅集吟誦、文學散步、書畫展演、學術研究，甚至是1960年代出現的祭禮活動、粵劇表演以及流行歌曲傳唱，宋王臺成為一個香港本地著名的文化景觀及標誌性旅遊名勝，但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成為一個在地的跨界別、跨團體的集體記憶。文化景觀與記憶之間有着極為緊密的關係塑造出了宋臺的三種特徵：本身只是物質性的自然景觀在人為塑造後具備特定含意的地方(place)、空間(space)與景觀(landscape)，同時也成為一種可以延展的精神象徵、符號與標誌，並且能夠在現實社會中發揮彰示正統、整合身份認同的功能性作用。

正如〈《宋皇臺紀念集》·序〉所說的：「若九龍之有宋皇臺，洵是民族精神之所寄，而表露於宋之後者也。」⁷又如〈宋皇臺紀念碑揭幕禮紀盛〉所說的：「從此，香港、九龍、又增多一具有特殊歷史價值之文化標識。」⁸宋王臺成為一個文化景觀與集體記憶，正在於它是「民族精神之所寄」與「文化標識」。當然，不是所有自然物質都能夠承載豐富的歷史故事而可以開發成景觀的。「宋王臺石刻」或其後的「宋皇臺公園」都是經過精挑細選並被賦予了歷史意義，是一種

⁵ 有關晚清遺老的民國觀感與態度的論述，參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

⁶ 本文關於「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的概念，由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提出，本文此處借用自戴麗娟的中文翻譯。詳見皮耶·諾哈編著，戴麗娟譯：〈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頁26–27。

⁷ 趙超：〈《宋皇臺紀念集》·序〉，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年），頁5。

⁸ 趙樹勳：〈宋皇臺紀念碑揭幕禮紀盛〉，《宋皇臺紀念集》，頁296。

有意識的塑造。十分關鍵的一點便是，它需要有一個具備記憶意願與現實動機的群體出現——哪怕只是一種機緣巧合的情況下，當圍繞着它的歷史記憶受到召喚，自然景觀的歷史、文化底蘊便因為人為的經營而營構出來。從陳伯陶(1855–1930)、賴際熙(1865–1937)等清遺老的歷史記憶中，我們不難看到：用以論證的歷史，不一定完全符合歷史的事實。關於這點，從研究者的一些現有論述中也告訴了我們——有關「宋王臺石刻」及九龍宋史，其背後有不少是故事性誇飾的，從而營構出虛實雜陳的宋末遺事遺蹟。⁹

九龍宋史源於清朝遺老及後來的文人雅士，他們對於歷史的理解以及出於對理想文化想像，結合一切有助於組合出九龍宋史發展脈絡的材料——諸如正史以外的野史或傳說，都會派上用場。因此，我們可以說，宋朝末代皇帝避地香港、忠臣死節、維護尊嚴、守護正統、不屈不撓的悲烈抗爭，這些行動與故事在「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的組裝下構成了新的歷史記憶符號。另一方面，「宋王臺文化景觀」也有助於引發、促進、凝聚、磨合人們的文化意識與歷史解釋，讓宋代歷史記憶獲得整合，成為時人、後人可以共同分享、公認的集體記憶。¹⁰同樣，集體記憶的象徵意義，也會與時俱進地在有所選取的情況下被「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使作為「記憶所繫之處」的空間、景點或景觀更具文化意涵、歷史底蘊與感染力，讓不同的人在文化景觀面前都有機會是不同程度地觸景生情，不只是同代相感，更可以是異代同音。

「宋王臺」集體記憶的建立與文化景觀構成的關係，學界已不乏研究。然而，關於1950年代的聖山被夷平後，「宋王臺石刻」如何轉化成「宋皇臺公園」的來龍去脈、前清遺老記憶系統在1950年代的發展問題，則未見有深入的研究。同時，戰前的香港政府對於宋王臺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及戰後重建管治威權的港英政府，這反映了時代轉變與戰後地緣政治複雜的一面。隨着時局發展，「宋王臺石刻」與「宋皇臺公園」的歷史記憶、文學敘事也透過新的景觀構造、典禮儀式與報刊媒體與時俱進地進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的複雜性與流變性。

⁹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頁310–20。另外，關於宋王臺與周邊宋史遺蹟的「發明」、「營構」的經過，以下學者亦有所論述：姚道生、黃展樑：〈空留古廟號侯王：論九龍城宋季古蹟的記憶及侯王廟記憶的歷史化〉，《思與言》第55卷第2期(2017年6月)，頁27–33；鍾寶賢：〈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頁1–43。

¹⁰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參姚道生、黃展樑：〈空留古廟號侯王〉，頁32–33。

二、懷念舊朝、忠臣死節：1949年前「宋王臺石刻」記憶系統之形成

嘉慶二十四年(1819)刊行的《新安縣志》記載了昔日官富場一帶的宋史遺蹟。第18卷的《勝蹟畧·古蹟》類別中可見涉及九龍宋史的記載：

丁丑年四月，帝舟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建北帝廟。

宋王臺，在官富之東，有盤石，方平數丈。昔帝昺駐蹕於此。臺側巨石舊有宋王臺三字。¹¹

《新安縣志》還提及了楊太妃女晉國公主溺死後鑄金身而葬之事。公主金身之墓，也就是後人所說的金夫人墓，它與「宋行宮舊址」一樣，其實均已湮滅無聞。但是自1915年前後，它們因為陳伯陶、賴際熙、吳道鎔(1852–1936)及蘇澤東(1858–1927)等前清遺老的吟遊唱誦、登臺雅集而引起關注。在遺老們群體式的吟唱雅集、結社推動之先，便有陳伯陶的連番考證與歷史記憶的挖掘工作：他率先將宋王臺故事歷史脈絡化，並以之為中心而將金夫人墓、代表宋行宮舊址的二王殿村、被視為是祭祀楊太妃弟楊亮節(1243–1324)的侯王廟一一展現。陳伯陶成於1915年的歷史考證如此記述：

予謂《新安縣志》稱：臺南北帝廟，為宋行宮舊址，今廟右有村，名二王殿，元人修《宋史》，以景炎祥興附。帝昺後為二王紀石刻村名，蓋皆傳自元時。《縣志》又云：臺後山有晉國公主墓。公主楊太妃女，死於溺，鑄金身以葬，俗亦呼「金夫人墓」。又臺之西北有楊侯王廟，相傳為宋季忠臣，不詳其名。余考之史，知即為楊太妃弟亮節。是皆宜磨崖書石，俾與斯臺並傳。¹²

陳伯陶的文章勾劃了宋末皇室的在港遺蹟，鋪陳了以宋臺為中心的歷史景觀。這篇文章本為聖山建成石垣後的立碑之用，俾使各方得知碑界內歷史遺蹟的故事。立碑設界，是要讓外界認識宋臺背後史事，引起各方人士重視石垣內的古蹟。在此之前，宋臺遺蹟於港府或居住於九龍城一帶的居民而言，並未得到重視

¹¹ 孫立川校補：《新安縣志》第6冊，第18卷，嘉慶己卯鐫、鳳岡書院藏版（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頁2。

¹² 陳伯陶：〈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宋皇臺紀念集》，頁91。

的古蹟，才出現聖山被嚴重破壞的結果。由此可見，自陳伯陶、賴際熙及其富商友好李瑞琴的出現，「宋王臺石刻」方才有機會發展成為一個有文化內涵的歷史景觀。¹³

陳賴二氏昔日同朝為官，並有姻親之誼。賴際熙於辛亥革命期間來港後，便於1912年任教於新成立的香港大學，教授經史學科。而陳伯陶則居於九龍灣一帶撰述東莞遺民錄，追述嶺南遺民的忠貞節義之事。賴際熙入室弟子李景康¹⁴(1890–1960)所記，二氏在1912年便已時常相約躑躅於宋王臺，素有保護勝蹟之志。1915年，當李瑞琴斥資把宋王臺山麓的石垣建成後，陳伯陶寫下了〈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繪畫出「故宋行宮遺址」，讓「易代避地之遺民」、「遺古之士」從此便有記憶所繫的人文空間。據此空間，他們可以「俯仰憑弔」、抒發故國之思。¹⁵

獲得修繕後的宋王臺，在當時也成為了一道公共旅遊勝地與九龍的著名文化景觀。人們可以通過一道小橋到達聖山腳下，然後沿着石垣邊界拾級而上，登至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樓，欣賞完樓門兩側的「一聲望帝啼荒殿」、「百戰山河見落暉」對聯，越門而過，便可登步至「宋王臺石刻」圍欄，然後憑欄遠眺，山海風光盡收眼底。至此，可謂是情景交融，懷故幽情油然而生。然而，宋王臺的文化景觀要成為一個集體的歷史記憶，還需要更多人舉辦儀式化的紀念活動後才能慢慢成形的。

1916年，陳伯陶以慶祝宋代遺臣趙秋曉的生辰為名，「大集同志」於宋王臺，「酒醑既設，魂招若來」；在莊嚴肅穆的祭禮儀式下，與會者吟詩作詞，抒發忠臣死節、國破家亡之悲情。所謂「和者喁喁，遂以盈帙」、「其歌有思，其聲有哀……曠百世而相感」，促成了《宋臺秋唱》的作品結集。¹⁶宋王臺的遺民歷史記憶系統，便在參與者的共同構思、共同建造下形成，並透過祭禮的儀式化、神聖化而昭示延續道統的姿態。「宋王臺石刻」所在的石垣場域，成為了憑弔者倚欄遠眺故國以述懷的獨特場合，成為他們闡述忠於前朝心跡，歌頌堅貞禦敵英雄氣節以及宣揚文化正統的象徵，成為其他同有異代之悲或現實政治感懷的文人

¹³ 鍾寶賢：〈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龍近代史？〉，頁1–43。

¹⁴ 曾任港府漢文視學官，1927年出任漢文官立中學首任校長。

¹⁵ 陳伯陶：〈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頁91。

¹⁶ 上述引文見於蘇澤東：〈《宋臺秋唱》·序〉，《宋皇臺紀念集》，頁233。

雅士的「記憶所繫之處」。隨著朝聖者日多，它也就成為香港居民慕名而至的觀光勝地，為公認的歷史遺蹟與文化景觀，形成了共構、共建及共享的集體記憶。

不論是清遺老，還是他們所反對的國民黨人，又或者是國民黨人所反對的共產黨人，甚至是國共兩黨都反感的汪精衛(1883–1944)派文人，在港期間都必定登臺憑弔，不是觸景而生情，便是發憤以抒情。當然，更多的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在假日期間登高遊覽。報刊以〈宋皇台畔之士女〉為題，講述摩登男女摩肩相接登臺遊覽——「情語喁喁者，羨煞途人不少」，¹⁷附近食肆也因此名勝而生意應接不暇。長年來，宋臺已成為中外遊客訪港的必遊景點。看在汪派文人眼中，緩步登臺的人群就「像螞蟻般在眼前蠕動着」。¹⁸

不同身份背景、不同政治立場與不同文化心態的人，登臺觀景，各有所想，這一切都是得益於宋王臺歷史記憶的締造者，一眾前清遺老的歷史考究及文學書寫，使一塊荒山巨石因為文學化的高雅敘事以及寓情於景的藝術化書寫，讓宋季史事及歷史遺蹟成為了歷史與文學的記憶，而異於一般的史料與普通人的口耳相傳的記憶。

宋季歷史遺蹟的記憶系統，塑造了宋王臺的文化景觀，而宋王臺這個人為塑造的文化景觀也有助於凝聚及締結想像的共同體，催生民族文化主義以及培育身份意識，讓遺民群體以外的同代或後代人重新認知香港的歷史意義。從元遺民到清中葉時期，鑄刻在聖山上那塊巨石上的，本來是「宋王臺」三字，但經陳伯陶的考證後倡議改稱作「宋皇臺」。因此，陳伯陶的詩文多用「宋皇臺」。然而，「宋王臺」是否應該一定要寫作「宋皇臺」，這在1920年代前後的清遺民群體中也未曾成為共識。對於宋臺作出最多歷史考證及歷史記憶追述的陳伯陶，十分強調遺民風骨，要嚴辨政治立場與正統皇權的維護，故其傾向「宋皇臺」而非「宋王臺」。賴際熙詩文中則往往使用「宋王臺」稱述，這或與賴際熙更多流露出故國之思與黍離之悲，彼此的歷史記憶意圖不盡相同有關。陳伯陶的主張或堅持，表明了他的歷史認知——趙宋皇室到達九龍灣時，南宋國祚仍未結束；正統皇朝之命脈不再身繫於向蒙古投降的臨安宋恭帝(1274–1276在位)，而是緊緊於漂流在外的端宗兄弟流亡政權。這樣一來，遺民的歷史視野與政治文化信念便得以延續，由逃離中原的保皇黨殘兵餘部或流亡政府，在反對蒙古入侵的抗爭行動中獲得了皇權賡續的合法性。賴際熙據此便對香港地域獨特性有所感嘆謂：

¹⁷ 〈宋皇台畔之士女〉，《天光報》，1934年2月18日，第3版。

¹⁸ 舒真：〈登宋皇臺〉，《南華日報》，1940年10月14日，第2張第7版。

九州何更有埏垓，小絕朝廷此地開

.....

宋道景炎明紹武，皇輿先後總南來。¹⁹

這便突顯了香港在士大夫眼中的獨特位置，是古今流亡者匯集之地。借用論者之言便是，香港不再被看作只是一個由英國殖民者管治下的避難之地——「而是延續中原政治道統的一個南方座標」。²⁰

在宋臺石刻這個文化景觀面前，不同的人被喚起的記憶，背後的歷史、文化、政治的意義都可能各有不同。²¹首先，忠於宋室的元遺民，為了抵抗蒙古人而在一塊巨石上鑿出一個石碑，用以宣示政治立場、抒發忠於故國的衷情。在二十世紀初期，它卻成為了一批流落香港而忠於滿清皇朝的遺老聚合之地，也成為他們維護中國文化、政治正統性的符號，藉以抗拒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的民國政權。遺老們是一群漢族士大夫，本是異族的滿清政權入主中原三百年來已成為中華文化道統的繼承者。他們異於晚清革命黨的種族革命觀，反把民國政權視為造成中國動亂的罪魁禍首，為中華文化釀成滔天罪禍的敵國。但是，到了1930年代，在抗日救國的時代呼聲及民族危機之下，清遺寄寓於宋王臺的各種前朝興亡、忠君節烈的思想觀念，在抗日救國時代的思想大潮下被人們轉化為愛國守土、寧死不屈、抵抗到底的精神符號。時人目睹日軍炸毀「宋王臺」巨石，亦是心感戚戚焉。前清秀才、正聲詩社成員黃偉伯(1872–1955)撰有〈平宋皇台作飛機場弔以一絕〉云：

宋皇金甌早不留，遺台今亦化平疇；

後人他日來憑弔，古跡難尋兩石頭。²²

詩文用了「宋皇」而非「宋王」，反映時人承繼了陳伯陶等人的正統觀念，抒發其對宋臺景觀被毀傷痛，同時也由此而引發國破家亡的黍離之悲。然而，不可

¹⁹ 賴際熙：〈登宋王臺作〉，《宋皇臺紀念集》，頁242。

²⁰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頁343。

²¹ Hon Tze-ki, "A Rock, a Text, and a Tablet: Making of the Song Emperor's Terrace as a *Lieu de Mémoire*," in Marc Andre Matten ed.,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Leiden: Brill, 2011), pp. 133–65.

²² 方寬烈：〈一部記述香港淪陷時期的詩作〉，《文學研究》2007年冬之卷第8期(2007年12月)，頁69。

忽視的還有，在抗日救國期間借「宋王臺」石刻景觀抒發懷古憶舊乃至於救時救國之情的，同樣見於被時人斥為漢奸集團的汪精衛派文人群體。汪派主張和平運動、曲線救國，其在港刊物《南華日報》也刊有〈登宋皇臺〉文章，以「和平運動」文化兵士身份自居、署名舒真的作者，因「宋皇臺」而觸景生情——嘆景物依舊而面目全非，抒發了他對「祖國命運」及被暗殺的汪派文人穆時英(1912–1940)的懷念之情。²³在另一邊廂，也有文人站在汪派的對立面，於香港於宋王臺景觀面前，遙念祖國、發憤抒情：

獨坐在宋王台畔，
望着遠山
望着近海
我沉思中國的興亡史
……
許許多的遊客，
於此間能有幾人
深感亡國的慘痛？
又可曾看到今日祖國
出現比秦檜，賈似道
更其下流卑劣的不肖子孫！²⁴

不論是宋「皇」臺，還是宋「王」臺，不同的南來人士對「宋臺」均有不同的文字表述。他們之中寫「宋皇臺」者，是因為本身的正統皇權觀念，還是因為讀了陳伯陶的詩文，因受到他的影響而行文時取「皇」捨「王」，目前而言實在是難以追究。但這兩者都同樣是不同背景的人自喻的愛國象徵與精神符號，是他們追憶歷史、思索國家前途的「記憶所繫之處」，然而他們又藉此精神意象各行其是、各有詮釋。類似這種可供援引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行文至此，著名的左翼人物筆墨也許就更加不應受到忽略。正如曾三度訪港的郭沫若(1892–1978)，他對於宋王臺的書寫或所抒發的情感，相對而言會較為人重視。宋王臺於他而言，似乎是具備特別象徵意義，成為他在港期間的「記憶所繫之處」。

²³ 舒真：〈登宋皇臺〉，《南華日報》，1940年10月14日，第2張第7版。

²⁴ 林林：〈宋王台畔〉，《星島日報·星座》第936期，1941年5月19日，第3版第2頁。

1927及1937年，郭沫若都曾高登宋臺憑弔石刻，並借「宋王臺」（郭沫若筆下寫作「宋皇台」）寫下多首詩作，用以抒發家國情懷，並鼓勵民眾關心民族興亡的問題。1937年12月，他在香港寫下〈南下書懷〉四首，記述其南下心境，用以表述抗日救國的決心與使命：

聖凡同一體，死有重於山。捨生而取義，仁者所不難。
 憂患增人慧，艱難玉汝成。死灰猶可活，百折莫吞聲。
 十載一來復，兩番此地游。興亡增感慨，有責在肩頭。
 遙望宋皇台，煙雲郁不開。臨風思北地，何事卻南來？²⁵

再結合論者所言，我們可以發現，郭沫若於1937年來港時，前後曾發憤作詩多首，用以抒發他抗日救國的滿腔激情。以下引述的其中三首，也是與「宋王臺」相關的。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當年是如何借筆下「宋皇台」來表明報國、復國的豪情壯志：

遠望宋皇台，煙雲了不開，亡秦賴三戶，何用遽心灰。
 敵人不足畏，可畏是悲觀，須當用全力，克服此兇頑。
 寇焰愈猖狂，我情愈悲壯。縱使退蘭州，依然要抵抗。²⁶

但凡朝代興革、國家興亡及時代變遷，都較易引發人們發思古之幽情，燃起人們匡時救世之志以及觸發感時憂國之情。文化景觀的歷史文化內涵與歷史記憶，讓憑弔者觸景生情、書懷託事，既發思古之幽情，同時延展戰鬥到底的記憶系統。正如郭沫若在文章所說的：「宋皇台不又成為了時代的象徵嗎？」用他的話來說，只要中國一天仍在面對政治動盪不安的局面，外侮禍患一天未除，則「宋王臺」的抗戰精神與山上的「龐大的頑石」，仍在召喚有意識的群體繼續為家國疆土與文化理想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郭沫若自言，當遙望聖山時，他都會不

²⁵ 郭沫若：〈南下書懷〉，《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汐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412-13。另外，第三、四首收入於《郭沫若全集》中的「自傳」一卷，用以說明他的南遷心史。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頁10。

²⁶ 蘇光文：《抗戰詩歌史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67-69。

期然地被山上石頭及其「所關聯着的一段歷史悲劇」觸動，從而產生「卻沉重地壓抑着我」的感觸，讓他要為國家民族貢獻其力。²⁷

於身為共產黨思想文化幹將的郭沫若而言，「遙望宋皇台」竟成為其對中國歷史長河記憶的來源與歸宿：

歷史在它長期停滯的期間，就像流水離開了主流一樣，只是打洄漩。宋朝在南邊攪完了，明朝又到南邊來攪完，現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時代了嗎？衝破那種洄漩，不讓歷史重演，正是我們當今的急務。²⁸

正因如此，郭沫若在1947年第三度來港時，在港居住一年時間，又寫下一首五言律詩：

十載一來復，於今又毀家，毀家何為者，為建新中華。
革新須革己，革己要犧牲，多少英雄血，激盪石頭城。²⁹

宋王臺成為了郭沫若寄託國家自強的歷史記憶的思想空間，也是他追求國家變革的思想動力。他由此而立定腳跟，寄望透過共產革命——終結中國歷史長河中的洄漩悔禍悲局，冀望在香港推動的共產革命事業，能夠創建新中華。這樣的記憶系統，與清遺老的追懷故國是不同的，但在抗爭的精神上則無甚差異、延展不息。

不過，較為全面延展遺老記憶系統的，應是1950年代南來香港的一些國民黨人、資本家、工業家、技術人員、教育工作者，和萬千勞苦大眾，他們同樣自覺是失去國土、失去工作位置甚至是生活所在的中心位置的一群。他們流寓異地，在英國管治的南方小島這個文化邊緣地方成為邊緣群體。他們一如郭沫若，在宋臺面前誓要在大時代巨變中，找尋自我、發揮自我、完成自我。

²⁷ 上述引文出自郭沫若：〈南遷二·遙望宋皇台〉，《郭沫若全集：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頁10。

²⁸ 郭沫若：〈南遷二·遙望宋皇台〉，頁10-11。

²⁹ 韋秀程：〈郭沫若佚詩一首〉，《郭沫若學刊》1988年第3期，頁57。

三、1950年代「宋皇臺公園」文化景觀的建造

(一)參與「宋皇臺公園」建造的人與事

1949年國共易幟，現代中國迎來另一個巨大變局。昔日有前清遺老不滿民國新政而流亡香港，1949年則有一批不滿共產黨政權的親國民政府社群湧港。於陳伯陶、賴際熙等遺老而言，民國乃是敵國。那麼，1950年代參與「宋皇臺公園」創建的群體，當中也不乏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共產黨視為「敵國」之人。敗退臺灣的蔣介石(1887–1975)，把「反攻大陸」定為1950年代的首要施政策略。香港一隅成為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重要墊腳石，也被用作窺探中共情報的前哨站。在港的大批宗親會、同鄉會、工會組織、社會慈善團體、教育機構以及傳媒機構都是國民黨見縫插針的統戰對象與外圍組織。1949年選擇南來的逾百萬人口，在政治認同上自然是較多傾向於國民政府，當中不少活躍於學界或教育界的人士也曾經出任黨國軍政工作。³⁰

來港知識群體中，對香港的宋季遺史深感興趣而又作出不少研究的，主要有任教於香港大學的簡又文(1896–1978)、饒宗頤(1917–2018)二氏。簡又文的《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饒宗頤的《九龍與宋季史料》，將宋室南下播遷的歷史以相對規範化的學術研究形式鋪陳出來，努力釐清宋帝南下的路線與香港的宋史遺蹟。同時，關注宋臺的還有香港政府當局、九龍社區組織與宋皇室後裔趙族宗親總會。上述各方關注宋臺的問題時，在動機與目的上均各有側重。

首先，香港政府當局面對的問題是，為了拓展機場跑道如何妥善安置宋王臺歷史遺蹟的問題。³¹

戰後香港，隨即受到環球冷戰氛圍影響，³²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問題，港英政府於1947年便已急於計劃拓展香港機場——由區域性的機場升格為可供長途

³⁰ 陳學然：〈時與變：戰後香港的私專教育事業〉，收入李帆、黃兆強、區志堅主編：《重訪錢穆》（下）（臺北：秀威資訊，2021年），頁153–80。

³¹ 港府文件顯示，基於港府要擴建啟德機場，故要處理被日軍炸爛的「宋王臺」遺蹟的問題。參“Sung Wong Toi Garden, Kowloon, 1956–1964,” HKRS 156 DS-1-4457.

³² 關於戰後美國與蘇聯引發的冷戰對峙以及香港在冷戰氛圍下面對的複雜地緣政治、港英政府的管治方式，可參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另參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飛行的新式噴射機升降的國際機場。新式的大型噴射機升降必須配備長而寬的跑道，這樣才能便利於英國在戰後香港執行經濟、政治乃至軍事上的緊急應變方案。³³港府必須為萬一發生的中美戰爭或中英衝突的撤退方案預作準備，讓大型飛機可以在港升降以直航形式貫通歐美世界。

1951年的“the Broadbent Report”，便論及擴建機場對於香港身陷冷戰地緣政治戰爭中的重要性，特別是1950年中大陸涉足韓戰後的最新地緣政治變化。香港被劃歸於西方自由世界的陣營，但中國參戰也導致香港被美國和聯合國實施禁運，嚴重削弱香港作為轉口港的功能與角色。冷戰的鐵幕從歐洲大陸蔓延到東亞地區，粵港交界的羅湖成為冷戰的新邊疆，羅湖以北的人被歸類為「共產黨人」(communists)，羅湖以南的則被歸類為「自由人民」(free people)。“the Broadbent Report”強調了在這種對立的冷戰狀態下，香港要加緊發展連接西方世界的航空網絡，讓往返的飛機可以在一個國際化的香港機場升降。更為實際的現實考慮是，一旦英國的飛機在東亞遇上緊急情況時，時局已不能夠讓英國飛機一如既往般在香港附近的中華民國高雄機場升降，也不能夠求援於廣州及汕頭的中國大陸機場。³⁴此外，為了讓香港能夠引入先進的、更高技術且更具運輸能力的新機種，擴建機場跑道同樣也是件刻不容緩的事。

1950年，香港在機場的短程跑道限制下，飛機只能連接臺南，再接連至日本的東京，澳大利亞的悉尼，美國的檀香山和三藩市，以及歐洲的法蘭克福和巴黎。因此，對英國人來說，面向全球噴氣式新飛機品種帶動下的政治及經濟考慮，實際上也決定了香港在冷戰格局下被劃歸進西方民主陣營的新定位。故此“the Scott & Wilson Report (1953)”及“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Report (1953)”便決定要擴建香港的機場跑道，而倫敦方面也準備投入鉅資一億美元重建啟德機場。“the Scott & Wilson Report”詳細地釐訂了機場的擴建模式及實施規劃，³⁵

³³ 詳見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roject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Kai Tak Airport” (387.736 2 PRO) pp. 1–3；此外，涉及啟德機場擴建的原因、目的的論述，可以特別參考當中列述的四份不同年份出台的報告書：“The Broadbent Report (1951),” “the Scott & Wilson Report (1953),”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Report (1953),” “Memorandum by Colonial Secretariat [of Hong Kong] (1954).”

³⁴ 參 R. Broadbent, “Ministry of Civil Aviation Survey Report, Aerodrome Development at HK (Kai Tak) Airport,” 14 June 1951, p. 11.

³⁵ “Memorandum by Colonial Secretariat,” June 1954, pp. 1–2.

於聖山所屬的九龍灣一帶擴建一個長約九千二百英尺、寬約一千零六十英尺的海角空地，用以興建航站樓設施、行政大樓、停機坪與跑道等等。那麼，機場擴建工程便會從聖山附近一帶海岸一直延伸至鯉魚門海峽。故此，夷平聖山以擴建機場跑道，便成為港府在戰後初期基於冷戰時局亟待解決的問題。

然而，聖山早於1899年便已載入政府的古蹟保護條例，由於山上仍留有未被日軍炸破的「宋王臺石刻」，因而「頗為人所關注」；而港府欲夷平聖山的消息傳出，也引起社會反對。據收藏於港府市政事務署的檔案顯示：

有人提出反對，認為當時九龍半島租借與英國之時，有特別規定，須將宋皇臺石及該石所在之小山予以保留。³⁶

面對在地華人的這般態度，港府未敢倨傲怠忽，直接向倫敦的殖民地部大臣請示，目的便是不想激起不必要的爭訟。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時人對於宋臺殘石充滿依戀與懷念，一些人也難掩聖山有天會被夷平的內心悲痛：

嶙峋殘石委蒿萊，依舊春花寂寂開。

.....

匈奴未滅千秋恨，官富難容百尺台。

弔古傷今餘涕淚，可堪日墓烏哀鳴。³⁷

為免激起民憤，港府延緩剷平聖山的行動，把1952年1月本已開展的機場擴建工作及移平聖山的行動暫時擱置（見圖1）。³⁸當局聲稱要等待倫敦專家抵港評估機場跑道長度後，再決定是否有剷平聖山的必要。另一方面，港府也在去函求助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大臣，希望核實清廷與英廷昔日有關聖山及「宋王臺石刻」保護協約的真偽。無疑，港府延緩拆毀的工作是明智之舉。假如港府

³⁶ 佚名：〈宋皇臺石刻移置之經過〉（此文譯自香港政府市政事務署保存的英文檔案文本，題目為《宋皇臺紀念集》編者所代加，文稿並無提及原作者姓名），收入《宋皇臺紀念集》，頁265。

³⁷ 詩人自注：「時有夷平聖山，擴建啟德機場之議」。而詩名的「辛卯」亦即1951年。見區靜寰：〈辛卯春暮登宋王台〉，《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頁336。

³⁸ 有關處理「宋王臺」的新聞報導，1952年1月9日《工商晚報》第4頁的〈剷平宋王台工程進行中〉一文則是一個分水嶺。因為港府暫緩有關工程，繼這則新聞後要直至1955年8月底才再有如何安置宋王臺的新聞見報。

於1951年便貿然展開夷平聖山的行動，對於戰敗後重臨香港而管治聲望大不如前的英國殖民地政府而言，公然漠視民意的風險，後果如何實是難以預料。³⁹

但當擴展機場直接涉及英國在港龐大利益及政治考量時，港府便要千方百計地把夷平聖山當作一項目標進行，但同時也必須在不橫生枝節的情況下，做好各種安撫在港華民民族情感的工作。港府獲得倫敦證實並不存在傳說中的中英雙方必須保留聖山及宋臺石刻的法例後，便在1955年2月繼續執行原定計劃。然而，港府在此之前便已主動找上了趙族宗親總會（宗親會）洽談，向宗親會尋求安置石刻的建言。港府之所以選擇該宗親會，固然是對該會的尊重，也是對中國人社會重視「正統」的思想遺緒的把握，同時更是一種吸納地方力量以及消滅民眾不滿聲音的公關手段。此舉似乎在於告訴一般民眾，當作為宋朝皇室後裔的趙族宗親總會，也站在政府這邊參與聖山夷平以及重新安置石刻的工作時，則其他人士也不應該多加置喙，而是應該為香港的長遠經濟及社會發展傾力相助。港府不得不為其夷平聖山爭取話語權，而建造公園安置宋臺石刻則增加其行動的合理性與民意支持度，對樹立港府的管治威信是有一定裨益的。

至於趙族宗親總會，它以宋朝皇室遺裔自居而公開活動。基於這一血統源流，宗親會的代表們在重置宋臺石刻這件事上被賦予異於其他社團的特權，有機會親與港府商議安置遺蹟的公園選址問題，凸顯其優越的身份。⁴⁰有趣的是，在清遺民努力闢劃宋王臺精神空間的時候，並未有在港宋室後裔參與。宗親會於1934年成立，因為1950年代「宋皇臺公園」的建立，千年皇裔身份為政府制度化認可。這於趙族而言無疑是宗派盛事，有助提高宗族在殖民地上的社會知名度。於港府而言，此舉表現了對中國歷史傳統乃至文化正統性的尊重，並拉攏更多的社團組織協力管治社會。宗親會也主動向港府提出承擔修建中英文紀念碑的工作，同時出資出版《宋皇臺紀念集》以誌慶。當然，宗親會的這兩項工作都涉及了對宋史的專門研究，也須由相關學術專業的學者方能應付。

九龍樂善堂及九龍城街坊會，是兩個在地重要華人社區團體，它們在推動「宋王臺石刻」保護與社區宣傳工作上也發揮了助力。社團領袖得悉啟德機場擴建而夷平聖山的消息後，便在1955年6月向當局詢問宋王臺古蹟保存問題，另

³⁹ 關於英國人在戰後重返香港執政所遇見的挑戰與因應之道，見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重建香港〉、〈戰後變化和楊慕琦計劃〉，收入《香港簡史——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162–70。

⁴⁰ “Correspondences Regarding the Sung Wong Toi Garden, 1957,” HKRS 177 DS 1-9.

在1955年12月8日建議政府在聖山舊址一帶劃出適量空間供三十餘萬九龍城居民休憩之用。他們表示當局要設法疏導急劇增長的九龍城人口，特別是遊玩無所的兒童如未能在本區獲得遊樂空間，將有礙他們的身心健康。直至1955年12月中旬，當局覆函樂善堂及九龍城街坊會的查詢時，才正式向外通知機場擴建的計劃。當局認為聖山原址正好地處機場跑道六百碼內的安全保護區，為免飛機升降發生意外、造成生命死傷問題，故「宋王臺石刻」將會被遷移至距離聖山三百呎外的一個新興建的公園裡。⁴¹我們可以從時任華民政務司鶴健士(Brian Charles Keith Hawkins)的覆函裡看到，港府的態度是十分親善的：

關於宋王台事，蒙台端惓懷備至，政府深表謝意，函中所談問題，政府早經考慮多時，已決定在譚公道之西，即該道與宋王台之北面，興建公園一所，庶使宋王台大石之主要部份，具有歷史性事跡者，得在此間永久保留，此等字跡，即台端所舉列者也。似此殊可告慰矣。專此函覆，即希查照。⁴²

對於當局的反應，身為社團負責人的鄭命光(1977-)心懷感激，讚賞有嘉說：「當局此項闢設公園，保存古蹟措施，造福居民不鮮，具見俯順輿情，愛民若赤誠，使吾人感德與慶幸者。」⁴³可想而知，港府在應付地區組織的工作上，事先已是贏取了人心與輿論。

最後，最重要的群體也許就是生產知識的南來學人了。作為上述兩項工作的實際操筆者簡又文，歷任國民政府秘書、逾十年國民政府立法院議員及廣東文獻館主任，他來港後在港大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如果說1910年代至1920年代之間，召喚宋史記憶、創造宋皇臺文化景觀最力的是陳伯陶，則在1950至1960年代繼承這一角色的人便是簡又文了。

1956年，港府興建「宋皇臺公園」之際，簡又文便應允宗親會邀請，出任〈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撰寫工作的召集人。參與其事的還有林仰山(1892-1974)、羅香林(1906-1978)、饒宗頤諸人。1957年初，趙族宗親總會理事長

⁴¹ 〈闢宋王臺公園〉，《華僑日報》，1955年12月14日，第2張第1頁。

⁴² 〈設公園保存宋王台古蹟，九龍城居民深感興奮〉，《華僑日報》，1955年12月16日，第2張第1頁。

⁴³ 同上注。

趙聿修(1905–1974)致信簡又文，邀請他主編《宋皇臺紀念集》。⁴⁴該紀念集自1957年開始編製，直至1960年才出版，前後為時三年。據簡又文稱，出版延宕是緣於中英文碑記由原稿撰寫、譯寫、中英碑石書法以及圖案等等的多番修正與審定，費時甚久。⁴⁵待碑文於1959年12月下旬完成後，趙族宗親總會便立即與港府當局、地方社會團體領袖，擇定當月28日舉辦揭幕典禮。1960年出版的紀念集，收入了紀念碑揭幕禮當天的照片、主禮嘉賓致辭及活動詳情，全書史料豐富，把清遺至近人的考據、「宋皇臺公園」成立來龍去脈等史料輯成一部三百五十頁的文獻。

(二)記憶空間的延續：「宋王臺石刻」遷移及「宋皇臺公園」的建立

港府早於1950年，便計劃把被日軍炸毀的聖山建成公共遊憩園地，並已委任專人設計公園圖則。在規劃過程中，港府獲承辦者告知尋回了刻有「宋王臺」三字的石塊。1953年，當局規劃在原地興建公園安置石刻，但因民航處處長以機場跑道擴建及飛機升降安全之故，必須把聖山夷平，致使建園計劃擱置下來。1954年年底，華民政務司建議先鑿出題字部份予以保存；以華人領袖馮秉芬(1911–2002)為主席的「市政局運動場及園囿小組委員會」則建議在聖山附近另覓地方興建公園原區安置。同時間，上述提及的九龍樂善堂、街坊會等也相繼提出相同看法。

港府於1955年2月23日飭令工務司在現址之宋皇臺道與譚公道接壤處新闢公園，用以安置「宋王臺石刻」。惟這一計劃並未主動向外公布，這也側面反映了港府對石刻保存的重視且在處理此事上具有一定政治敏感度，並展現出有意改善與華人社區關係的意圖。職是之故，當在地社團紛紛向政府建言時，政府事先已作好了多方評估及具體規劃方案。致使華民政務司在回答華人社區的訴求時，能夠胸有成竹地闡述官方意見，表現出願意聆聽民意、開明親善以及尊重華人歷史情感的一面，這十分有助於港英政府建立良政善治的形象。而在當時與之對立的，便是曾經打敗英國人和把英國政權驅逐出香港的日本人。有關輿論，

⁴⁴ 趙立勳：〈籌建宋皇臺遺址石碑及編印紀念集彙記〉，《宋皇臺紀念集》，頁265–66。

⁴⁵ 簡又文：〈引言〉，《宋皇臺紀念集》，頁11。

早於日本投降後三年的1948年，社會便陸續有修復宋王臺遺蹟的訴求，敦促重返香港的港英政府要把被日軍炸毀的「宋王臺石刻」重新修復，使之發展成旅遊景點。⁴⁶

在1950年前後數年間，不少論述在彰顯石刻遺蹟對於華人有重大紀念意義的同時，均不忘抨擊日本人為了擴建機場而炸毀「宋王臺」這個地標的惡行，控訴日本人抹殺中國人的紀念碑在興建供奉日軍亡靈的忠靈塔與神社。論者曉以民族大義，既批判日本人，也提示重新掌權的港府要提出修繕「宋王臺」殘蹟，並將之發展成旅遊景點。諸如「日人爆石不祥」⁴⁷、「終被日人毀掉」⁴⁸、「日人侵略香港……將宋王台拆毀」諸論常見於報刊，⁴⁹用意在於提醒外來種族的日人與蒙元外族無異，都是侵略中國而帶來禍害的侵略者。

同時，在戰後的香港文壇，也有不少詩作感嘆「宋王臺石刻」及聖山被日軍破壞的悲痛及家國情仇，這些都反映了社會上對於保護「宋王臺」古蹟的呼求以及對於異國外族破壞文化景觀的憤恨輿情。⁵⁰此外，香港大學教授兼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1898–1982)，甚至以中國人對於「宋王臺」被日軍毀掉而「深感惋惜」來當面提醒港府第二把手輔政司要做好新發現的東漢李鄭屋古墓的保護工作。姑勿論李鄭屋古墓與「宋王臺石刻」在陳氏心目中的份量孰輕孰重的問題，其言談之間反映了無論是宋臺還是古墓，都是不容毀掉而必須珍而重之的，否則便會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情感的。⁵¹他也公開發表文章指出，宋王臺「這片石頭象徵着中國民族的抗敵的精神」。在他看來，日軍當年炸毀「宋王臺石刻」的動機，

⁴⁶ 參“Song Wong Toi,”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1 January 1948, p. 8. (筆者按：當時的英文報紙選用了帶有侮辱及歧視意味的“Japs”來稱呼日本人的，可見是另有涵意的。)

⁴⁷ 〈設公園保存宋王台古蹟，九龍城居民深感興奮〉，第2張第1頁。

⁴⁸ 〈宋王台古蹟建游樂場，九龍城街坊會向當局建議〉，《華僑日報》，1955年8月2日，第2張第1頁。

⁴⁹ 〈宋王台碑記今日揭幕，南宋淪亡的悲慘紀念〉，《華僑日報》，1959年12月28日，第1張第4頁。

⁵⁰ 相關作品如高澤浦：〈宋王台懷古台為日寇蕩平遺址尚依稀可辨二首〉、李景康：〈香港亂後弔宋王台遺址〉、方若文：〈宋王台懷古〉（千古艱難守四夷……如今更隳遺址，俯仰難尋嘉慶碑）。上述諸詩收入《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頁336、338、347。

⁵¹ 陳君葆著，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卷3，頁422。（記於1955年9月22日）

是在於「侵略主義者的日本是絕對不能容許這樣的反侵略的表徵的存在的」。他直斥這種毀掉古蹟以改寫歷史的做法是「非常可笑」、「笨拙」的。⁵²此言無疑有十分強烈的警世目的與作用。

那麼，作為同是外來的殖民者英國人，也許是有了種種的前車之鑒，在處理「宋王臺石刻」的問題上盡量做到廣開言路、聽取民意，主動做好夷平聖山後修建公園及安置石刻的補償工作。

從檔案記載可見，港府把這座公園的建設規劃視作為重要任務，規定建造公園的整個過程要具備「集體性」及「開放性」的諮詢程序。這種做法與港英政府一直以來自上而下的統治風格大相逕庭，極為罕見。究其用意，一方面是突顯「港府當局對此華人歷史性紀念物亦極為尊重」的表現，目的是說明港府對華人文化傳統與歷史的尊重；另一方面，港府也表示要將之發展成為在地華人的歷史紀念物，使其成為海外遊客參觀的景觀，提升香港的文化品位與城市形象。⁵³這兩點歸納起來，不外乎是要提升在地華人的歸屬感並贏得支持度。港府的舉措贏得了當地華人領袖的稱譽：「對於九龍之宋王台，不特不予毀滅，日盡可能予以保存」。⁵⁴這不僅提升了港府的聲譽，加強了管治威信，同時也對港府的正面形象發揮了不錯的宣傳作用。

的確，港府從巨石切割到石碑搬遷、公園設計、施工建築以至開幕禮，都花費了不少心思，並讓這些心思與努力能夠被公眾看見。⁵⁵香港當時的流行報刊《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大公報》、《南華早報》等在1955至1959年數年間，都連日跟蹤報導如何妥善搬移逾千噸重的大石，如何進行爆破、切割，又或者是如何興建公園以陳設巨石等等，⁵⁶緊密的報導，反映「宋王臺」前所未有地獲得香港居民的廣泛關注。

⁵² 陳君葆著，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3，頁422。（記於1955年9月22日）

⁵³ 上述引文均見於：“Sung Wong Toi Garden, Kowloon, 1956–1964,” HKRS 156 DS-1-4457.

⁵⁴ 〈宋王台古蹟建游樂場，九龍城街坊會向當局建議〉，第2張第1頁。

⁵⁵ 〈宋台石前勒碑：使中外遊客游宋王台公園者知所憑弔〉，《華僑日報》，1959年12月19日，第2張第1頁。

⁵⁶ 各報刊連日甚至數年跟進報導處理巨石的最新發展，內容上雖然大同小異，但大體上可反映出重新安置「宋王臺」殘石在當時有其一定的新聞價值，是時人所關注的事情。

〔下轉頁142〕

港府夷平聖山始於1955年12月26日，同時也對石刻所在的殘留巨石進行爆破；「宋王臺」三字的周邊石體被切割成方形塊狀。⁵⁷被切割成方塊的石刻，再經慢鑿細雕成「十呎六吋長、七呎六吋高、四呎厚」，⁵⁸而安放方形巨石的基座則「闊二十呎六吋、長十三呎，座身並刻有花紋」。市民眼見政府動工，輿情激動。報刊指出：「此消息各報刊載後，當地（九龍城）數十萬居民獲知，均感異常興奮，莫不欣然相告，亟望早日完成。」⁵⁹石刻於1955年12月26日起至1956年1月中旬期間進行切割，正值冬季，但不影響市民的興奮與好奇之心：「古蹟聖地在施工中，整日圍觀者頗眾」⁶⁰、「連日雖冷，但在該處觀看爆鑿古石者亦頗眾。」⁶¹在鑿切期間，甚至香港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也親往現場視察，對修建工作表示關注（見圖2）。⁶²公園及紀念碑的建造事宜由華民政務司、工務局、市政局三個部門合力籌建，港府隆重其事，可見一斑。

港府把新建的公園命名為「宋皇臺公園」，「王」變成「皇」，承襲清遺之見。陳伯陶在1917年的〈宋皇臺懷古並序〉便指出：「石刻舊稱『宋王』，以史稱二王而然，茲正之曰『宋皇』，蓋使後之人無惑焉爾。」⁶³正名以解惑、懷古以伸志，1950年代簡又文等人也強調「王」宜作「皇」，他們同樣自覺是承接起「宋皇臺」所代表的正統政治、文化意識。正統皇權繼承涉及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同時也是文化道統傳續的話語權依據，是千年知識傳統中的重要價值觀，正如王夫之所說的：

〔上接頁 141〕

以下僅舉數則：

〈港府決定保存宋王台石，將移放附近公園內〉，《工商日報》，1955年12月9日，第6頁。

〈宋王台石將遷新址，譚公園西關園安置〉，《大公報》，1955年12月9日，第4頁。

〈爆移「宋王臺」古石〉，《華僑日報》，1955年12月15日，第2張第1頁。

〈九龍城區名勝地，宋王台闢作公園〉，《大公報》，1955年12月16日，第6頁。

〈譚公道暫封閉，夷平宋王台遷移古石〉，《華僑日報》，1955年12月27日，第2張第1頁。

〈鬼斧神工話石工〉，《大公報》，1959年8月22日，第3頁。

⁵⁷ 〈宋王台山崗動工移平〉，《工商晚報》，1955年12月27日，第4頁。

⁵⁸ 〈宋王台古石，將只留一方塊〉，《工商晚報》，1956年1月12日，第4頁。

⁵⁹ 〈設公園保存宋王台古蹟，九龍城居民深感興奮〉，第2張第1頁。

⁶⁰ 〈宋王台山崗動工移平〉，《工商晚報》，1955年12月27日，第4頁。

⁶¹ 〈宋王台古石，將只留一方塊〉，《工商晚報》，1956年1月12日，第4頁。

⁶² 〈港督昨日參觀宋王台山聖石〉，《工商日報》，1956年4月26日，第5頁。

⁶³ 陳伯陶：〈宋皇臺懷古並序〉，《宋皇台紀念集》，頁235。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小人竊之，盜賊竊之，夷狄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為夷狄盜賊之羽翼，以文致之為聖賢，而恣為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⁶⁴

是以得知，士人或知識份子，縱然失位，但其正統守護者的身份，支撐他們在流離愁困的歲月下自尊其貴，能以匡正時會、兼濟天下。港英政府當年能夠立例保護「宋王臺」，已讓清遺生發「外人尚解尊王意，石檻深深護古臺」之嘆。⁶⁵那麼，當1950年代的港府斥資興建公園——還將公園正名為「宋皇臺公園」時，則更具多層深遠意義。（詳見後文論述）

「宋皇臺公園」位於啟德機場旁邊，在車馬熙來攘往的三條主幹道之間（見圖3）。它於1956年7月開始建築，至同年10月落成，並於一個月後的11月正式向公眾開放。公園正門口豎立了四根類似華表的大石柱，雕上祥雲遊龍。進入公園便可見及三塊石碑。公園中軸線終端、座北向南而立的便是「宋王臺石刻」（見圖4）。公園左右兩方，各陳中、英文紀念碑，碑文名為「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碑文詳細記述宋王臺的歷史意義和搬遷過程（見圖5），同時也道明了「宋王臺」如何從石刻演變成一個新紀念景觀的過程，並凸顯港府當局保存古蹟之用心。⁶⁶在整個景觀的空間設計上，當局着意突顯其復古的東方色彩。如石碑是採以「連州青」，而座腳及碑頂採用麻石，據說其目的是為了「增加古色古香之東方意味起見」並又特別在「碑頂刻出二龍爭珠圖案」。⁶⁷凡此種種，都是意在現代化的國際大機場旁邊建立東方古代風格的花園，讓四方遊客甫下飛機便感受到香港既現代化又歷史悠久的一面。

不過，機場代表着分離、遠遊，與「宋皇臺公園」標誌的流離遷徙、去國懷鄉情調有所呼應。即或不然，宋皇臺也讓人易生懷舊情志，心生歲月匆匆、時代巨變之感，致使人事、景觀皆變得淒惶無所寄。昔日在港大受教於賴際熙、區大典（1877–1937）的陳君葆，他路過「宋皇臺公園」，方形石刻勾起他的舊日

⁶⁴ 王夫之著，伊力編：《資治通鑒之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566。

⁶⁵ 黃翰華另為詩文作注云：「九龍已屬租界，惟此台以宋王遺址故，至今保存。」見〈宋王臺〉，《宋皇臺紀念集》，頁241。

⁶⁶ 〈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碑文為港府所準備，並無標明作者），《宋皇臺紀念集》，頁300–301。

⁶⁷ 〈宋王台兩石碑，純粹東方色彩〉，《華僑日報》，1959年12月26日，第2張第2頁。

記憶。然而，飛機場旁邊的「宋皇臺公園」，給他的只是名存境遷之感。他眼中所見的只是一塊被粉飾過的淡黃色石塊，「似非原石」的認識，讓其觸景生情，賦詩一首曰：

機場軋軋聽機來，別有廊房面面開。

丈八隻餘馳道在，不知何處覓王台！⁶⁸

表面上看來，座落民居附近的「宋皇臺公園」，是居民的日常休憩場所與兒童遊樂場，失卻昔日聖山寧靜而莊嚴的神聖空間。不過，它在戰後搬遷及重建過程中，則廣泛地進入香港華人社群的眼簾。不可忽略的是，「宋皇臺公園紀念碑」的隆重揭幕禮尤具時代意義。它反映了冷戰時代裡，香港作為「東方的柏林」、「難民天堂」，是一個展示西方民主價值與經濟發展優越面的「窗口」，同時也是作為保衛「文化中國」的符號。

四、高舉正統、弘揚春秋大義： 「宋皇臺」記憶系統之延展與冷戰地緣政局

1950年代，「宋皇臺」歷史記憶的發展與文化景觀的重構，與中國政局丕變，人潮南來湧港息息相關。南來的文人雅士猶如清遺般，帶着去國懷鄉的悲思，流離遷移至香港這個域外之地。宋臺對於這個居港新群體來說，如當時清遺寄情之地一般，是他們發思故幽情、顯揚正統的符號與「記憶所繫之處」；宋遺的忠義與犧牲精神，在冷戰年代中再次被高舉為民族精神的象徵。

1950年代，一個地緣政治複雜而環球充滿對抗的冷戰年代，宋臺石刻移置至新的公園，與英國政府擴建香港機場鄰。正如上言，機場與英美的環球軍事與經濟戰略關係密切，也直接涉及英美在港利權與安全撤退的問題。冷戰時期的香港，已不是英國獨治的香港，美國介入東亞地區使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轉變為「東方的柏林」。⁶⁹ 1954年，身為英國殖民地部轄下官員的港督葛量洪，在冷戰

⁶⁸ 陳君葆著，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4，頁219。（記於1958年10月24日）

⁶⁹ 1949年，英國外交官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簽署《北大西洋公約》時，創造了一個名為「東方的柏林」的術語，並逕直將之與香港緊密扣聯起來。見Mark Chi-kwan, "A Reward for Good Behavior in the Cold War: Bargaining over the Defense of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2.4 (2000): 837-61.

時期竟獲派承擔外交部官員的職責，出訪美國進行外交官的活動。他穿梭各地，向美國政商領袖講解香港在貫徹始終地執行美國對華政策。

葛量洪自述在美「行程六週，到過十幾個城市」，每到達一個城市，均會發表公開演說「兩次或以上」，而演講主題分別為〈香港——在東方的柏林〉、〈香港——自由的堡壘〉。不難看見，他的演講主題充滿了鮮明的冷戰色彩與濃烈的東、西意識形態對立味道。⁷⁰表面觀之，把香港闡揚為「東方的柏林」是形象、生動地概括了香港的新地緣政治位置與新戰略角色。

當然，借用論者的研究，上述的冷戰修辭不一定能夠完全如實反映香港冷戰態勢或真相，可能也不無誇大了香港的冷戰局面。⁷¹然而，我們從這裡適可見出，戰後港英政府在東亞局勢中，面對美國實施的中國禁運及封鎖香港海路運輸壓力下，不得不與美國保持同一陣線的苦衷。同樣，也是要與美國同調的前提下，英國方能在政治、經濟及金融上求突破，求發展。故此，港府必須回應冷戰局勢，方能換取美國共同防衛馬來西亞及香港的承諾。雖然這些承諾未有轉化成英美雙方的具體盟約，但它們實際上規限了英國在國際冷戰格局中的政治舉措與施政方式。港英政府不得不在中美兩個大國的夾縫中，小心翼翼地採取政治中立的管治策略，在兩國之間謀求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狀態。正因如此，香港在有意無意間扮演了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冷戰橋頭堡，是中西冷戰雙方的最前線，並因此而成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同時也不得不在中、英、美各大國相互爭逐的夾縫中掙扎求存。最後，這一切都塑造了香港社會文化在方方面面都出現了模糊性、混雜性與邊緣性的特質。

承上，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香港於地理上既位處中國大陸的南方國門，但在意識形態上卻是西方集團的一部分；在思想領域上，它是一個介乎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新區域，兩種意識形態相互競爭，緊密互動。香港是東西政治力量共存之地，北京政府與英國政府的關係是既合作又相互競爭，北京政府和臺北政府的不同政治勢力在此或明或暗地進行各種政治活動，海外華人與非華人也同樣可以在此自由工作生活。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正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冷戰橋頭堡、窺探冷戰雙方的前哨站，英國於冷戰時代才有機會對香港延續其殖民管治，並且重建其在地管治威信。

⁷⁰ 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著，曾景安譯，趙佐榮編：《葛量洪回憶錄》（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頁216。

⁷¹ 相關論述參羅永生：〈從韓戰管窺香港的冷戰文化〉，《思想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31-32。

要之，在上述時局背景下，觀察「宋皇臺公園」的文化景觀塑成的經過與用意，可以讓我們解讀出冷戰期間港府當局熱切支持宋皇臺建園方案的用心。從文化冷戰的角度來觀察新宋臺景觀的塑造，有助我們看到「記憶」與「空間」是如何地在冷戰時代被交織運用、藉以達到爭取人心的效果。⁷²從學界的現有定義裡，「空間」的運用，不像土地、地點和領土那樣具體或固定；相反，它可以是一個象徵和符號，通過劃分前線、接觸區域和影響範圍來影響人們的思維、情緒和行為。⁷³同時，「空間」的概念，也可以通過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來表達，它將人類的情感和期望引導到特定的目標，為人們組建起一個團體、討論政治和執行紀念儀式提供一個中介點。⁷⁴根據上文的討論，「宋皇臺公園」的成立基本上是一一反映了這些定義裡的內容與要求，不僅滿足了各方的政治需要，也折射出香港社會多樣性的交織和流變性。

基本上，戰後英國環球軍事實力及政治影響力不斷衰落，港英政府管治香港比戰前困難。它一方面受制於美國制定的東亞冷戰議程，另一方面還要受共產主義的威脅以及國民黨在港反共行動造成社會不安的雙重挑戰。1956年的九龍「雙十暴動」，造成逾六十人死亡、三千人受傷，促使港府大力打擊國民黨在港勢力。社會關係撕裂而矛盾重重。「宋皇臺公園」在暴動平息後兩個月便啟用供公眾使用，這有助於港府與社區人士修補關係，進而樹立港府尊重華人歷史文化遺產的開明形象，也見證港府要與社區力量共同協作的意願。再從冷戰角度觀之，「宋皇臺公園」的建成，既展示了香港可作為「文化中國」的寫照與縮影，也符合東西冷戰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爭取大批南來「難民」人心的文化策略。⁷⁵

⁷² 參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頁142-61。

⁷³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p. 229-91.

⁷⁴ 參Asa Boholm, "Reinvented Histories: Medieval Roma as Memorial Landscapes," *Ecumene* 4.3 (1997): 247-72; Owen J. Dwyer and Derek H. Alderman, "Memorial Landscapes: Analytic Questions and Metaphors," *Geo Journal* 73.3 (2008): 165-78; Oto Luthar, "Monuments, Mediatization and Memory Politics: The Slovenian Post-Socialist Memorial Landscape in Transit," in Marusa Pusnik and Oto Luthar, eds., *The Media of Memory* (Leiden: Brill, 2020), pp. 25-41.

⁷⁵ 相關研究參趙綺娜：〈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歐美研究》第27卷第2期(1997年)，頁65-108；容啟聰：〈綜論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識難民〉，《台灣人權學刊》第6卷第1期(2021年6月)，頁87-94；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思與言》第57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43-44。

「宋皇臺公園」在冷戰時期的香港具備多重政治涵意，它喻示了有深厚中國歷史文化的香港，與當時的中國大陸是有所區別的。共產革命在當時所宣揚的是要推倒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君權、父權、夫權——它們是構成舊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社會管治觀念，而中國內地於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的「破四舊」運動，唯物主義對傳統文化作出刨根問底的清算，這一切與「宋皇臺公園」的建立及其倡導的思想價值是水火不容的。中國帝皇歷史、文化傳統乃至推動「宋皇臺公園」建立的宗族文化，於香港卻受到了港英政府、商界領袖及學界代表人物的高度重視。趙族宗親總會會紳趙樹勳（生卒年不詳），便將1959年揭幕的「宋皇臺公園紀念碑」看作是「官民協力合作、經營籌建」的成果。⁷⁶紀念碑從樣式設計、碑文內容推敲到剪綵典禮，都被視作華洋官民之間和洽共處、齊心協力的合作成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冷戰時局觀察此舉所表現的效果，用冷戰的修辭描述便是——有助於港府爭取人心，贏取在港華人的思想意志（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Hong Kong Chinese）。

在「宋皇臺公園紀念碑」揭幕的剪綵典禮上，署理華民政務司石智益（Hon P. C. M. Sedgwick）的公開演說，高度肯定了宋帝對抗蠻夷以維護文化正統的悲壯節義，並把「王」正名為「皇」。出自英國管治者口中的正名與陳述——宋帝「與元兵力戰以挽宋祚及其殉國之史實」的故事，弔詭地幫助香港市民建立歷史記憶，提醒他們華夷之辨的民族大義。此舉反過來卻又有助英國管治者爭取華人支持，使他們為之效忠。職是之故，港府在興建宋皇臺公園花費逾十萬，⁷⁷金額不多卻有效地讓在地華人商學群體與趙族宗親總會的人事網絡變得更加緊密團結，因其徵集各方意見，凝聚共識，在一度引起社會動盪不安的「雙十暴動」後，塑造出官民協力、共建香港社區的景象。華民政務司還表明，除了「宋皇臺公園」的景觀，港府還要把李鄭屋村的漢代古墓、大嶼山與長洲的考古，聯合起來一併發展成為旅遊景觀，藉此增加海外遊客訪港人數。⁷⁸此舉有助於提升香港的城市形象，並促進香港市民對本地以及文化故國的歸屬感。

也許是在上述考慮因素的基礎上，促成港府承接清遺及簡又文等人的見解，把「宋皇臺公園」外的公眾街道命名為「宋皇臺道」，而不是「宋王臺道」。我們目

⁷⁶ 趙樹勳：〈宋皇臺紀念碑揭幕禮紀盛〉，頁296。

⁷⁷ 香港歷史檔案館：“Sung Wong Toi (The Hill of the King of Sung) Kowloon City,” HKRS 410-10-3.

⁷⁸ 〈宋皇台遺址碑記，揭幕禮隆重舉行〉，《華僑日報》，1959年12月29日，第2張第1頁。

前雖然仍未找到政府的官方解釋或背後原因的有力闡述，但從結果來看，選用代表帝皇的「皇」，棄用本由皇帝封賞的「王爵」的「王」，在承接文人雅士的政治文化信念的同時，亦有助於爭取他們的人心與歸屬感。於學界知識社群而言，這代表了官方在修建公共空間文化景觀時，尊重了他們的政治、文化意願，也肯定了他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正如簡又文所說的：

「王」應作「皇」，因元脫脫修宋史而不承認宋二帝為正統……今港政府有「宋皇臺公園」、「宋皇臺道」，宜矣。⁷⁹

當然，不可忽略的是，透過強調「宋皇臺」的文化故國歷史感與傳統文化觀念，港府很可能在一方面樹立「正統」中國在香港的意願，使「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以外還有更具凝聚力的「文化中國」可供憑寄；另一方面也是要藉此抵消中國大陸與臺灣所強調的在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所要做的只是為香港人塑造出一種古代的、抽象的中國人身份，進而培養出「對於中華文化傳承感與認同感」，由此說明中國文化與殖民管治之間其實兩不相違，彼此完全可以和平共存的。⁸⁰這也是「宋皇臺公園」展示政權合法性 (legitimacy) 與合理性的象徵意義與文化符號，也有助於港府建立在地民眾基礎與管治的合法性，進而延續其戰後在香港的殖民管治。

另一方面，改「王」為「皇」，於趙族宗親總會而言無疑是增添了榮寵感，港府認同了他們作為宋皇室嫡傳世系的身份，這對於宗親會提高在地社會地位與聲望無疑有好處。宗親會「自動協助製成碑記」作為回報亦自光門楣，大筆刻劃「宋皇臺」象徵的民族精神與文化正統，協助市政局籌備盛大的開幕典禮、擬定出席典禮的政、學、商不同界別代表人物，使典禮成為城中盛事。凡此種種使其獲得港府的肯定與褒揚。⁸¹

⁷⁹ 簡又文：〈宋皇臺是民族精神的象徵〉（四），《華僑日報》，1961年2月13日，第4張第3頁。

⁸⁰ 港府在戰後藉學校課程檢討及改革來加強「傳統文化主義」教育，當中關於政治管治的論述，可參高馬可：《香港簡史》，頁184。

⁸¹ 趙樹勳：〈宋皇臺紀念碑揭幕禮紀盛〉，頁299。另見署理華民政務司石智益：〈宋皇台碑記揭幕演詞〉，香港歷史檔案館：“Sung Wong Toi (The Hill of the King of Sung) Kowloon City,” HKRS 410-10-3。

此外，宗親會與港府的協力，也有助於強化港府的民意基礎。在宗親會的活躍成員中，不乏新界本土殷紳富商如趙聿修家族，也有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中將及國民革命軍將領的趙超（生卒年不詳），他們獲邀參與「宋皇臺公園」的興建，同時又組織文字工作團隊搜集宋帝南來史料、聘請簡又文擔任主編的工作以及自資出版《宋皇臺紀念集》，記錄下官、學、商共建「宋皇臺」文化景觀的來龍去脈，近呈香港總督及各司，遠寄英女皇、殖民地大臣及大英博物館。理事長趙聿修的信函裡，不忘稱讚港府對中國歷史的葆愛之情，盡顯趙族宗親總會向港英政府輸誠的用心。

「宋皇臺公園」在設計上刻意加入了中國古代建築風格與文化元素。但從旁人或後人驟眼觀之，它置身於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旁，同時又是毗鄰機場而「鐵鳥日夕喧」，⁸²始終是缺少了昔日聖山的那種寧靜、肅穆、莊嚴的氛圍。舊日的參訪者，必須從山腳拾級緩步攀登而上的朝拜過程，在新的公園裡完全沒有了。遺民們發自內心的禮祭或者是訪者攀山涉水而至的虔誠，都會大大增加追憶過程中的儀式感與神聖感。即使是一般的遊客，他們也可以在觀摩聖域過程中，擺脫日常生活的乏味，感受別樣的生活情趣。然而，在繁雜喧囂的機場旁邊，「宋皇臺公園」是否真的可以讓人安靜、肅穆地發思古之幽情，這不禁讓人存疑。

不過，這樣的一個新時代下的文化景觀可以視為一個擁有結合新舊政治功能的複合體，而不只是一個異代懷古的代名詞。它也是港府展示其如何與在地紳商合作經營的政治標誌，讓英國人在戰後藉以爭取華民人心。最終，不同力量都可以在宋皇臺的文化景觀中各得其益。

相對於 1920 年代在野及位處邊緣的遺老社群，戰後港府在合理、合法化宋史在香港發展史的脈絡化過程中的投入，甚至是由官員親自登場宣講宋帝故事以及表揚宋遺的忠貞勇敢，這本身也構成了一個新的文化景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港府直接成為了「宋皇臺公園」的其中一個的「記憶生產者」（memory producers）以及形塑文化景觀的推動者。當然，港府本來的目的是因應機場跑道擴建而安撫民心，但在興建新的歷史紀念空間以延續宋季記憶，則無異於肯定了流亡者的抗爭故事以及展示對他們的認同，進而透過把「宋皇臺公園」設定為外國遊客的

⁸² 顧植槐：〈宋皇台公園〉，收入《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頁 350。

觀光勝地，⁸³這反過來也使香港的文化景觀與政治空間被賦予了一種「自由世界」與「文化中國」結合的新定位。如此來看，「宋皇臺公園」的成立為殖民管治與中國傳統文化找到相容不悖的共存共生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宋皇臺公園」外，石智益在典禮上還公開指出要發展更多可供遊客及本地居民觀賞的歷史景觀與古蹟展覽。他注意到南丫島及大嶼山海濱有極古的考古發現，李鄭屋古墓的古物也得到了保存，接下來可以繼續加強香港與新界區的考古工作。他倡言，即將落成的香港大會堂可以闢出部份區域，專為香港古蹟展覽之用。如此做的目的，在他看來，便是希望能夠塑造更多的文化景觀吸引遊客，同時讓全港市民對歷史古物產生興趣。其言曰：「本人更希望考古之工作更能發揚光大，使全港人民對於古物之發現均能發生興趣。而對於前賢所給予吾人之文獻，更能深加領畧，而增進一頁光榮歷史。」⁸⁴不難看出，戰後重返香港的英國管治者在面對中國歷史古蹟的態度上，多了一分敬意與誠意，故說他們在1950年代末扮演了「記憶生產者」以及形塑文化景觀的推動者，也十分合理。

對於以流亡者自居的親臺灣國民黨政權或蔣介石政府的人而言，南宋抵抗蒙古的歷史記憶便顯出現實意義，在提醒着他們要對敗退大陸的國民黨政權及其倡導的革命事業心存忠誠。這一點，簡又文編輯的《宋皇臺紀念集》便有很多弦外之音。該紀念集是一部結合了歷史文獻、歷史著作、視覺圖像和個人對「宋皇臺」抒懷述志的綜合彙編，文獻數量十分可觀，涵蓋了歷朝歷代各時段的相關記錄與作品，橫跨了從十三世紀到二十世紀50年代包括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詩人詞人的古今著作。

編列於紀念集首數頁的，均為港府要員及華人政商名流的題詞。在葛量洪督港期間，擴建機場跑道而遷移「宋王臺石刻」至「宋皇臺公園」，他為文集題下「文獻足徵」四字，代表了官方對這部文集的宋史認證，也沒有排斥華人對於「古代中國」或「文化中國」的愛國情感。相反，在現實社會裡，港英政府於1950至1960年代實行的是去政治化的社會管控措施。不獨打擊共產黨在港的大小活

⁸³ 署理華民政務司石智益的〈宋皇台碑記揭幕演詞〉指出：「本人認為此石碑之建立，不特增進公園之風光，並使此名勝地點更能吸引海外遊客，而大眾對於香港之歷史及考古之研究，亦能藉此而引起興趣。」相關資料見香港歷史檔案館：「Sung Wong Toi (The Hill of the King of Sung) Kowloon City,」HKRS 410-10-3。

⁸⁴ 石智益：〈宋皇台碑記揭幕演詞〉，見於香港歷史檔案館：「Sung Wong Toi (The Hill of the King of Sung) Kowloon City,」HKRS 410-10-3。

動，也在1956年「雙十暴動」後嚴厲取締國民黨在港的各方勢力，同時也限制美國的冷戰戰士在港活動，避免挑動北京政府的敏感政治神經。⁸⁵因此，當簡又文編纂《宋皇臺紀念集》或主導〈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的構思時，當中遣詞造句便不可能帶有「反共」、「反俄」或「反蘇」的字眼，最多只能用相對含蓄的方式表現他們對於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懷念以及對於共產中國隱諱的曲線批判——亦唯有如此，《宋皇臺紀念集》方能通過港英政府的政治審查。

畢竟，葛量洪港督在治港問題上是如履薄冰的，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中美關係。正如前文所言，當英國政府在美國外交壓力下委派本屬殖民地部的香港總督赴美演講，這事本身已是十分不尋常，反映的是美國對於香港當局在執行聯合國制裁中國政策時虛與委蛇的態度是十分不滿的。葛量洪訪問美國時，向美國政界及媒體公開述說香港，運用了「東方的柏林」、「民主的堡壘」等等的冷戰術語，這些政治修辭是要釋除美國當局關於港府在實施中國禁運問題上鬆懈的疑慮。同時，他在香港也小心翼翼地避免把香港推向韓戰、冷戰的抗共前線，更加反對治下的香港成為反共的基地而觸發北京政府關於香港管治權的威脅。借用論者之見便是，一切涉及影視、出版、結社等等的政治審查，不獨用在中共在港勢力身上，同時也用在反共的國民黨勢力乃至於反共的美國在港勢力身上。⁸⁶

職是之故，參與紀念集及「宋皇臺公園紀念碑」建設的社群或團體，只能十分隱晦地表達他們在冷戰時局下的微妙政治立場。透過這本古色古香的文集，趙族宗親會領袖人物趙超在署名撰〈序〉時，固然不能表態其政治立場，但刻意亮出他曾經作為孫中山時代的陸軍中將身份，抒發他對宋臺民族大義之感。元遺刻鑿「宋王臺」於石塊的行動，所標誌的精神便是後人念念不忘的抵抗胡元的愛國行動，這在他眼中是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之所寄」。⁸⁷簡又文雖已躋身香港最高學府，但其〈獻書辭〉不脫其激昂民族情懷，而現實政治涵意亦呼之欲出：

衛我國家，保我民族；寸土猶存，正統紹續；
耿耿貞忠，誓圖光復；人心未亡，一成已足；
力戰不降，寧死不辱；宋臺千秋，正氣長肅。⁸⁸

⁸⁵ 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頁150—55、180—82；麥志坤：《冷戰與香港》，頁217。

⁸⁶ 相關論述見羅永生：〈從韓戰管窺香港的冷戰文化〉，頁30—35。

⁸⁷ 趙超：〈序〉，《宋皇臺紀念集》，頁5。

⁸⁸ 簡又文：〈獻書辭〉，《宋皇臺紀念集》，扉頁。

簡又文的長篇〈引言〉，把紀念「宋皇臺」的性質說成是宋亡於蒙元的一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亡國之大紀念物」，把明亡於清視為第二次亡國紀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當前紀念「宋皇臺」的意義轉化為「表彰宋帝忠義節烈之不朽功德」、「發揚愛國家保種族之春秋大義」。⁸⁹中華民國未如宋明般宣告亡國，播遷至臺灣的蔣介石政府仍在傾力策劃如何反攻大陸，紀念「宋皇臺」最要緊的意義是彰顯忠義節烈的精神，如此方能支撐敗退異地的流亡政權「國祚」不斷、「國魂」不亡。由是，他們正進行的「宋皇臺」紀念工作，甚至是與港府當局合力籌建公園、編輯紀念集，表面上是在做歷史遺蹟的修復、保護工作，但在他們而言其實另有心意，並且這些工作也另有其他功用。「宋皇臺」喻示了流亡者永不言棄、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象徵着「華夏國魂」繼續抵抗「蠻暴」，直到「正義」獲得伸張。⁹⁰這種種陳述，都有其現實的對照意涵。

簡又文揭櫫「宋皇臺」在維護春秋大義、嚴分夷夏以抵抗蠻暴的用意，當然不是指向港英政府，更加不是在臺灣推行專制獨裁統治的蔣介石政府；春秋大義的民族意識與守護正統的政治含意，針對的對象呼之欲出。當然，簡又文不能把話點破。當時任職於新亞書院、沒有參與港府官方主導的「宋皇臺公園」慶典的沈燕謀（1891–1971，1952年新亞書院註冊五名校董之一，新亞書院圖書館館長），他便清晰不過地點破了「宋皇臺」紀念的目的或意圖。他把昔日的抗元逕視為今天的抗共，而抗共的矛頭則在於反抗共產政權背後的操控者俄羅斯，他這樣說：

余赴新亞治事，往還必由此道，日必二次，多則六次，似乎習見，而興亡之感，每每不能自己，蓋我人今日處境，大與宋末相似，繼宋而起者胡元，繼民國而佔神州大陸者，名為毛共，實則俄寇也。⁹¹

於1949年來港的親國民政府的其他知識社群而言，大多都與沈燕謀持類似的政治立場與思想觀點，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蘇俄外族的異端思想。⁹²但整本紀念集之中，均未出現這類明顯的政治敏感詞彙。為紀念集

⁸⁹ 簡又文：〈引言〉，《宋皇臺紀念集》，頁9–12。

⁹⁰ 同上注，頁9。

⁹¹ 沈燕謀：〈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于右任詩詠宋亡台〉，朱少璋主編：《沈燕謀日記節鈔及其他》（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272。

⁹² 這些論述遍見於與簡又文同年來港的錢穆及唐君毅諸南來學人的論述。錢唐共同創辦的新亞書院，當中的教師群體便有十分清晰的反共政治立場。相關研究見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19、73–117。

賜下墨寶或序文的還有國民黨元老于右任(1879–1964)、總統府資政趙恒惕(1880–1971)以及總統國策顧問梁寒操(1899–1975)等人。他們以古雅優美的毛筆字，彰顯文集的歷史貢獻。文集作者數人中，尤以梁寒操的詩文的微言大義最具政治意味。他不僅將宋代遺民的記憶與1950年代聯繫起來，還將新的「宋皇臺公園」確立為1950年代流亡者的聚集空間，將之視為延展歷史記憶的獨特場域，詩文極其沉鬱悲愴：

九龍千古傷心地，遺黎今更難忘記。

宋皇臺已景全非，遺蹟猶思保千禩。

……

卅年世變幾滄桑，九龍今又聚流亡。

不堪回首家山破，忡忡來對此茫茫。

……

又文自是有心人，穩踞黎床不帝秦。

此書輔國將無極，所南心史同千春。⁹³

梁寒操的詩，最末數句固是稱說簡又文編輯文集的用心，但重點在於表揚他在困頓之時仍效忠故國，不與新政共謀，還把他的編著之功比同鄭思肖(1241–1318，號所南)的《心史》。《心史》以「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的正統價值觀守護者自任。⁹⁴梁寒操以此比附文集之於《心史》，披露簡又文編輯文集的政治立場與用心。

梁寒操本身並非一般的學者文人，他曾於1945年代表國民黨與代表共產黨的周恩來(1898–1976)舉行重慶談判，並歷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秘書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中將副部長、中國遠征軍政治部主任、中央宣傳部長兼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要職，是當時公認的「三民主義理論專家」，專責政治意識形態宣傳事宜。他於1949年移居香港後任教於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學者創辦的新亞書院，同時兼任臺灣《中華日報》董事長。至1954年，梁氏出

⁹³ 梁寒操：〈題宋皇臺紀念集〉，《宋皇臺紀念集》，頁7。

⁹⁴ 鄭思肖：〈古今正統大論〉，《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35。

任臺灣官方的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美文化經濟協會會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務。⁹⁵以梁寒操的從政履歷觀之，他對「宋皇臺」的抒情述事異於一般人，其涵意也不能等閒視之。他在國民黨從政四十年的經歷，使其組合出冷戰時期的反共「宋皇臺」歷史記憶，把敗退流亡直視為猶如十三世紀的宋室那樣，逃離蒙元統治等同於不帝新秦。

事實上，梁寒操之見也十分吻合簡又文的用意。簡氏本身也有意識地向普羅大眾推揚「宋皇臺」所代表的民族意識，使之成為當代人的共享記憶與公認的精神符號——「今日，我們看見『宋皇臺』三字，當知這正是此民族精神之象徵。世界任何國族，苟無此精神，必不能生存的。」⁹⁶當他們在高舉「宋皇臺」象徵的民族主義旗幟時，也表明了他們對於民國政權的忠誠。是他們這個親國民黨的社群著意塑造的文化正統，象徵了對共產中國的政治抗爭立場。「宋王臺石刻」流傳下來的故事既在精神上安撫了他們，同時也在行動上鼓勵他們要對「前朝」或故國表示忠誠。

於是，忠誠節義便成為了1950至1960年代圍繞「宋皇臺」各種敘事文本與活動的主題，描劃出冷戰時局下香港華人在多重政治、國家、民族及身份意識的擠壓下出現的社會集體精神危機。「宋皇臺」成為了自我身份何去何從的叩問與追尋。

五、忠義精神的象徵：「宋皇臺」歷史記憶的延展與普及化

1964年6月，一套名為《宋皇臺》的粵劇在「宋皇臺」石碑揭幕禮後的數年裡上演，一度引起哄動、一票難求。⁹⁷居住美國的粵劇著名文武生祁筱英（生卒年不詳）返港，招聚李寶瑩（1938—）、梁醒波（1908—1981）、梁素琴（1928—2022）、陳錦棠（1906—1981）、賽麒麟（1933—？）、徐小明（1953—）、李若呆（生卒年

⁹⁵ 梁寒操先生治喪委員會：〈梁故中央評議委員、國策顧問寒操先生行狀〉，《梁寒操先生紀念集》（臺北：梁寒操先生遺著編纂委員會，1976年），頁1—4。

⁹⁶ 簡又文：〈宋皇臺是民族精神的象徵〉（五），《華僑日報》，1961年2月14日，第4張第3頁。

⁹⁷ 參〈宋皇台優點多，定票多早爆棚〉，《華僑日報》，1964年6月20日，第6張第4頁；〈粵劇淡風中的一株勁草，祁筱英組班演出〉，《華僑日報》，1964年6月6日，第6張第3頁。

不詳)等報載「都是粵劇壇中的一流人材」,⁹⁸上演宋帝昺(1278–1279 在位)即位至投海以及百萬臣民效忠赴難的戲碼。整套劇的主調在於宣揚效忠與鐵肩擔道義。

1969年,「宋皇臺公園」作為「活現空間」,舉辦了「趙族宗親念祖禮」,此次祭典由趙族主導而集結「劉」、「關」、「張」共四大族姓,他們合祭「歷代祖先暨忠臣義士」,四族數百名人與社會名流共濟一園,施行祭祖禮,把宋皇臺標榜為「忠義」精神的匯聚與象徵,昭示「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桃園結義精神與寧死不屈的氣節。獻花禮分為:趙族代表向列代祖先獻奉「日月同光」花環,趙族代表向宋代忠臣義士獻奉「浩氣長存」花環,趙族代表中華民國趙族宗親總會獻奉「孝友仁愛」花環,⁹⁹九龍城、灣仔區民政署的前線官員與社會團體、慈善組織代表共同向「宋代忠臣義士紀念獻花」。¹⁰⁰由此可見,「宋皇臺公園」建成後一方面供人休憩之用,另一方面也是讓人憑弔歷史,甚至是舉行儀式性的祭典場所,是用以召喚歷史記憶與聚合身份認同的文化景觀。

「宋皇臺」象徵着離散、漂泊、遷移,也標誌著「知其不可為」但又「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冒險精神,並且承擔家國天下的責任感、民族尊嚴感以及守護家國的民族意識。陳伯陶、賴際熙那代人南下而登臺雅集,他們遙望中原,同時反過來自我安慰——雖然處身窮荒夷地,但為餘生覓得了安身立命的理想「樂土」。¹⁰¹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香港人口結構改變,逾半人口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新一代;香港便是他們的家園,他們早已不再自視窮居夷地。但是,隨著香港1997年前途尚不明朗、港人對於從十年文革浩劫走出來的中國大陸因了解甚少而感到不安,憑弔宋皇臺而關注自身身份意識問題的,是那些為了文化故地或固有生活世界即將面臨轉變而殫思竭慮的戰後新生代。

當時間到了1980年代,已經走出冷戰陰霾的香港,旋即面對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大陸的問題;港人產生信心危機,思索去留而移民他國的問題瀰漫一時。

⁹⁸ 〈祁筱英組班演出,月底在大會堂上演宋皇台〉,《華僑日報》,1964年6月6日,第6張第3頁。

⁹⁹ 〈宋王台公園昨舉行趙族守親念祖禮〉,《工商日報》,1969年12月23日,第6頁。

¹⁰⁰ 〈趙氏宗親會宋皇台行念祖禮〉,《華僑日報》,1969年12月23日,第3張第1頁。

¹⁰¹ 遺老藉宋皇臺歷史記憶的恢復而得以保存中原正統文化,雖流亡至外夷管轄的殘山賸水而自感是身居樂土。有關論述詳見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頁301–45。

就在《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及頒布的1984年，由著名填詞人盧國沾撰寫、歌星麥潔雯主唱的《龍壁懷古》面世；宋皇臺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景觀以另類形式出現於各種大眾新媒體之中：

威逼的星眼凝望，哀傷的夕陽殘照。
多少的風雨侵蝕，刀刻的故事已散掉。
孤清的一塊小石，現在龍城又更渺小。
火捲過大地，任它灰燼風裏飄。
石頭記，弓箭在腰，風捲去舊事，或者有壯烈怎再昭。
石頭冷，不再炫耀，或者往事已盡遺忘，事蹟早消失了。
那個奪勝，那一個戰敗，日後已寂寥。
誰曾在此處痛失家國在悲叫，無奈情景遠逝。
時人在歡笑，消失的一個朝代，竟不知誰曾憑弔。
幾多飛機過頂上，問有幾架路過陳橋。
它身邊坊眾千萬，但有幾個住腳靜瞄。
香江的一塊古石，在這海角漸已無聊。¹⁰²

有別於文人雅士詠懷的古典詩詞，它用了「石頭記」、「古石」的歷史，既說「宋皇臺」的故事，同時也意在敘述香港的身世及其與中國歷史的關係，精煉而深刻地回應1970年代末期以來社會大眾關注的日常議題，致力於恢復港人的歷史文化記憶，用「宋皇臺」展示香港的歷史圖景，說盡百年滄桑與家國情懷，希望告別被英國及日本輪番統治的厄運，更加期盼重塑民眾的民族意識，進而呼喚港人靜下來思索香港的前世今生。

「宋皇臺」本讓憑弔者為故國招魂，在後冷戰時局流變下被賦予新的象徵意義；在新一波的流離變局下，提醒人們對於文化故園要有所憶舊與守護。但「忠義」故事傳唱出的，是時人對國族身份認同的困惑與迷茫。「宋王臺石刻」，見證着另一代人別離故土、流離遷徙他國他鄉的故事，折射出香港人複雜多變的家國認同與離散悲情。

1997年，到「宋皇臺公園」憑弔宋臺石刻的，仍不乏其人。時代變局催生了新一批的憑弔者，他們有新的記憶動機，這繼續增強了宋臺石刻的生命力，不僅

¹⁰² 參考自百度百科「龍壁懷古」條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E%8D%E5%A3%81%E6%87%B7%E5%8F%A4/20305765>（讀取日期：2022年10月9日）。

宣示香港重回國家懷抱，宋臺所在的這個「地方」也終於告別了民族的屈辱史。1970年代南來居港的作家黃河浪，在香港1997年7月回歸中國時刻寫下了〈宋王台〉一詩，在憶述宋、元、清、民初數百年的宋臺前世遺事後，下半闕筆鋒一轉，道出大變局下宋臺依舊屹立不搖，而這也象徵着國權不減：

東洋的冬陽凍僵
西洋的夕陽熄火
而凜然不動聲色的
一尊石頭 比時間更頑固¹⁰³

同樣是回歸前夕，鄰省文藝官員唐棟率領廣東文化採訪團訪港，自言「宋王臺」是此行最動其情思和勾起心弦的景物。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國家論述下，「宋王臺」不僅經歷了無數歷史硝煙，也見證了歲月的滄桑。它折射出的其實不只是香港的歷史影像，更加是國家民族的山河巨變。稱一到香港便要急着遊覽「宋王臺」的作者，帶有其清晰的記憶意圖與撰文意識，他讓宋臺石刻負載新的象徵意義——「富有民族氣節」、「凝聚了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愛國精神」、「給人以強烈的民族意識」——「寄托着香港人民民族情思」。作者在「宋皇臺公園」裡寓情於景，還賦予了宋臺巨石頑強的生命力與不能磨滅的精神象徵：

宋王台巨石帶着歲月的滄桑和歷史硝煙，靜靜地注視着面前的喧囂與繁華，於沉默中顯示出深沉，於滄桑中顯示出不屈，於堅實中顯示出自尊。她僅僅是一塊幸存的石頭，可她分明有血有肉，有鮮活的靈魂，民族的屈辱、氣節、呼喚、吶喊，全都熔鑄於這一方巨石之中，讓人深思和震顫。……山崗可以抹去，巨石可以炸毀，記憶和精神卻不能泯滅。¹⁰⁴

在回歸論述下，宋臺巨石折射的香港滄桑故事與民族屈辱已成過去，它也被賦予了新的生命情感——「在這香港就要回到祖國懷抱的日子裡，宋王台假如有靈，她一定會感到某種期盼已久的快慰。」¹⁰⁵來自中原陝西的劇作家唐棟，還專門編寫了《宋王台》戲劇講述香港的故事；而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在1997年

¹⁰³ 黃河浪：〈宋王台〉，《香港作家報》擴版號第24期，1997年9月1日，第8版。

¹⁰⁴ 唐棟：〈尋覓宋王台〉，《文匯報·文藝》第976期，1997年3月2日，C2版。

¹⁰⁵ 同上注。

也上演了大型的歷史話劇《宋王台》，更加憑此而榮獲曹禺戲劇獎、新劇目獎等等。「宋王臺石刻」或「宋皇臺公園」的歷史記憶，因應回歸的意識與動機而被收編進別異於中華民國的「新中國」國家大論述中。¹⁰⁶

六、結語

「宋王臺」的深層涵意是賡續文化正統、守護國土的民族意識，同時也印證香港歷史文化與中原淵源根脈的關係，象徵中原文化故國在極南之地播遷，是「遺民」、「難民」歷史記憶所繫之處與遣懷抒興的神聖空間。對於「宋皇臺公園」這個歷史遺蹟的修建，以至於官方、學者、商人共同構建出一個可以供民眾共享的文化景觀，於文人雅士而言有安撫與肯定的作用；對於港府而言，是其公開展示管治策略的政治空間，在冷戰時代下以政治中立的手腕平衡多方勢力的利益，對在地各方採取既聯合又取締的手段，讓戰後本應面對解殖危機的殖民政權，因為冷戰局勢及地緣政治之故而得到延續。港府藉此增加了在港華人對港府的認同以及香港一域的歸屬感，同時也促進香港市民建構文化故國的抽象身份認同，由是抵銷國共兩黨在香港營造的政治化民族主義，進而體現殖民管治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可以說，「宋皇臺公園」的建設及其相關歷史文化意義的宣傳，發揮了讓人意想不到的功用。

宋史遺事在九龍的發現，是按照有記憶意圖的人從各種正史、野史或民間傳說中精選出來的；「宋皇臺」的文化景觀與歷史敘事得以發展，既然有其現實上的政治影響因素，因此它也是一個人工雕琢而成的文化景觀。「宋皇臺公園」與《宋皇臺紀念集》的製作，呈現出的「文化中國」意味，與地理空間上的中國形成對照，反映了參與塑造宋史記憶系統的在地社群透過正統觀念的闡揚，利用文化民族主義凝聚社會，塑造切合冷戰時代的文化政治觀念。這些由港府與親國民政府的商、學社群所構成的「文化中國」意識，使香港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的文化冷戰對抗之中，成為一個既包容又排斥、既涇渭分明但又可以相互協商的政治空間。

無論是民初香港還是冷戰時期的香港，「宋皇臺」在不同時期的南來者的手上成為了一座紀念中國文化正統的碑誌。它在南來者視角中，是證說香港聯繫

¹⁰⁶ 宋皇臺歷史記憶與香港人的身份建構，並不是止於1997年——甚至是宋皇臺暗含的抗爭意識，也不是停留於清末或冷戰時期的香港。同時，宋皇臺的記憶書寫與記憶生產，也不是只限於少數的知識份子。相關論述見姚道生、黃展樑：〈空留古廟號侯王〉，頁63-64。

中國歷史根脈的紐帶、是貫通古今文化的精神標誌，也是引發民族情感的思想源泉。因此，這個文化景觀在不同時期、不同人手上均有不同的政治作用與文教意義，成為現今時代的意識形態爭鬥爭的部份組成內容。至於召喚人們記憶與文化景觀背後的歷史故事，有多少是真實無誤的，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用顧頡剛的話來說便是「不立一真，惟窮流變」，¹⁰⁷從這一角度出發，研究「宋皇臺」的歷史敘事及其組成歷史記憶的材料，毋須執著或真或假的問題。宋史遺事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景觀得以發現創造，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意圖的出現或動機指向的本身問題，並由此觀察它們如何與時俱進地更迭發展，從而產生何種時代意義。

時至今天，「宋皇臺公園」隨着宋代古井的發現、宋皇臺地鐵站的開通而更為人共知。當局於人潮湧動的地鐵站顯要位置另闢「聖山遺粹」展覽專區，透過深埋地下的古代器皿的重見天日，扮演了敘述宋史遺事的功能與角色，試圖告訴熙來攘往的人們一個有關香港的有根歷史文化故事，重新塑造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及國家身份認同。「宋王臺石刻」及「宋皇臺公園」所代表的力抗外侮、團結人心、守護正統、弘揚忠義的記憶系統與流變無窮的價值觀念經久輾轉相傳，於中國歷史教育積貧積弱的今天，相信會在當下乃至未來「說好香港故事」與「國家安全教育」主旋律下舊調變新曲，¹⁰⁸並且與大灣區的其他宋末君臣活動遺蹟連成一個歷史文化教育的網絡，符號化的團結抗外愛國傳統會繼續成為價值觀念的教育範本。不過，「宋王臺石刻」或「宋皇臺公園」的多元政治文化意符與發展歷程畢竟是十分多元與複雜的，不是把一堆古代地下物件陳設出來便可闡明，單一的文本也不容易展現其曲折多變的文化內涵及其於香港歷史發展脈絡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宋王臺」的歷史敘事、集體記憶以及善用此一文化景觀，是考驗故事講述者與使用者的一塊試金石。

¹⁰⁷ 顧頡剛：〈答李玄伯先生〉，收入《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1，頁313–14。

¹⁰⁸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於2021年5月，因應2020年6月30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出版了《中國歷史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推動香港國安教育。當中有關中國歷史科的教學指引，希望學生能夠「認識宋末皇室與中原人士的南來、香港經濟發展的概況」。文件建議：「教師可透過地圖或實地考察活動，讓學生認識宋末皇室與中原人士南來，了解其與香港地區生活和定居人口的關係，並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學生能理解宋元時期香港與國家的互動情況及緊密的關係，讓學生明白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從而提升學生的國家觀念。」相關文件參考教育局網頁：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nse_subject_framework_chinese_history.pdf（讀取日期：2022年9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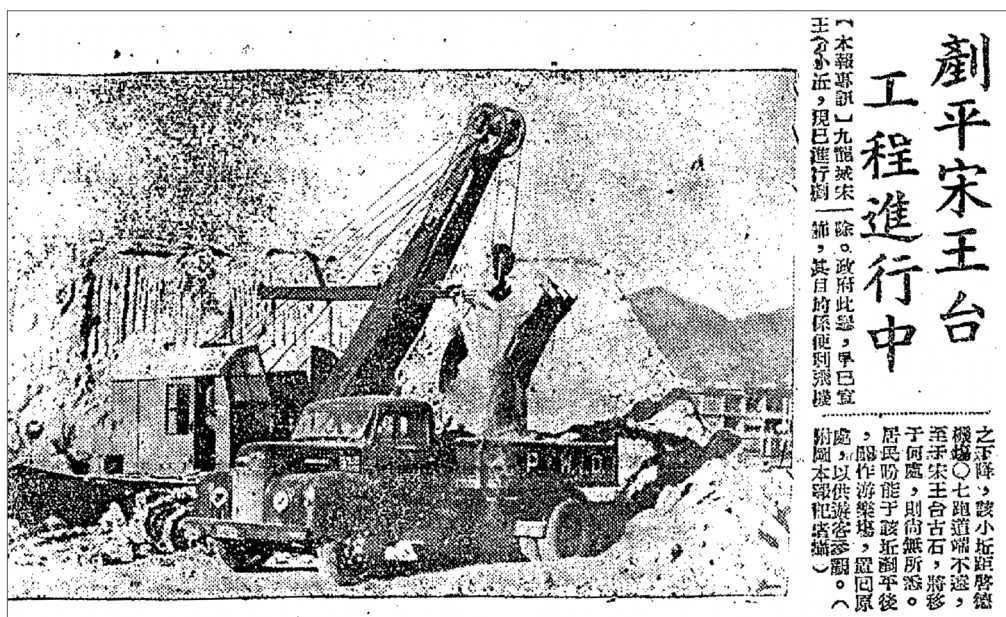


圖1：港府夷平聖山

（資料來源：〈剷平宋王台工程進行中〉，《工商晚報》，1952年1月9日，第4頁。）



圖片說明

(上) 港督昨參觀宋王臺爆破、切割工程，用之噴沙機。(本報記者呂攝)

港督昨日參觀

宋王台山聖石

【本報專訊】由於興建機場而移去之宋王台山，該山之聖石決予保存，放在鼓山後開闢之「宋王台公園」內。港督昨日曾參觀此巨大之聖石。據悉，該石原重一千噸，現裁至三百三十噸，工人現正設法將此巨石豎起。(一)

合隊四十五分，個人冠軍曹悅強、梁慶全、阮雄輝、賴光儒等最有希望。

又訊九龍國泰會堂棋枰合，昨晚更爲熱鬧，觀衆數百人，合賴光儒擔任主枰，政權者計有黃學禮、李國林、邱榮等，均台主勝，續由名手王根攻打第四陣，截至發

圖2：港督視察宋王臺爆破、切割工程

(資料來源：〈港督昨日參觀宋王台山聖石〉，《工商日報》，1956年4月26日，第5頁。)



圖3：宋皇臺公園

（資料來源：筆者於2022年3月攝於宋皇臺公園。）



圖4：宋皇臺公園內的「宋王臺」方形巨石
（資料來源：同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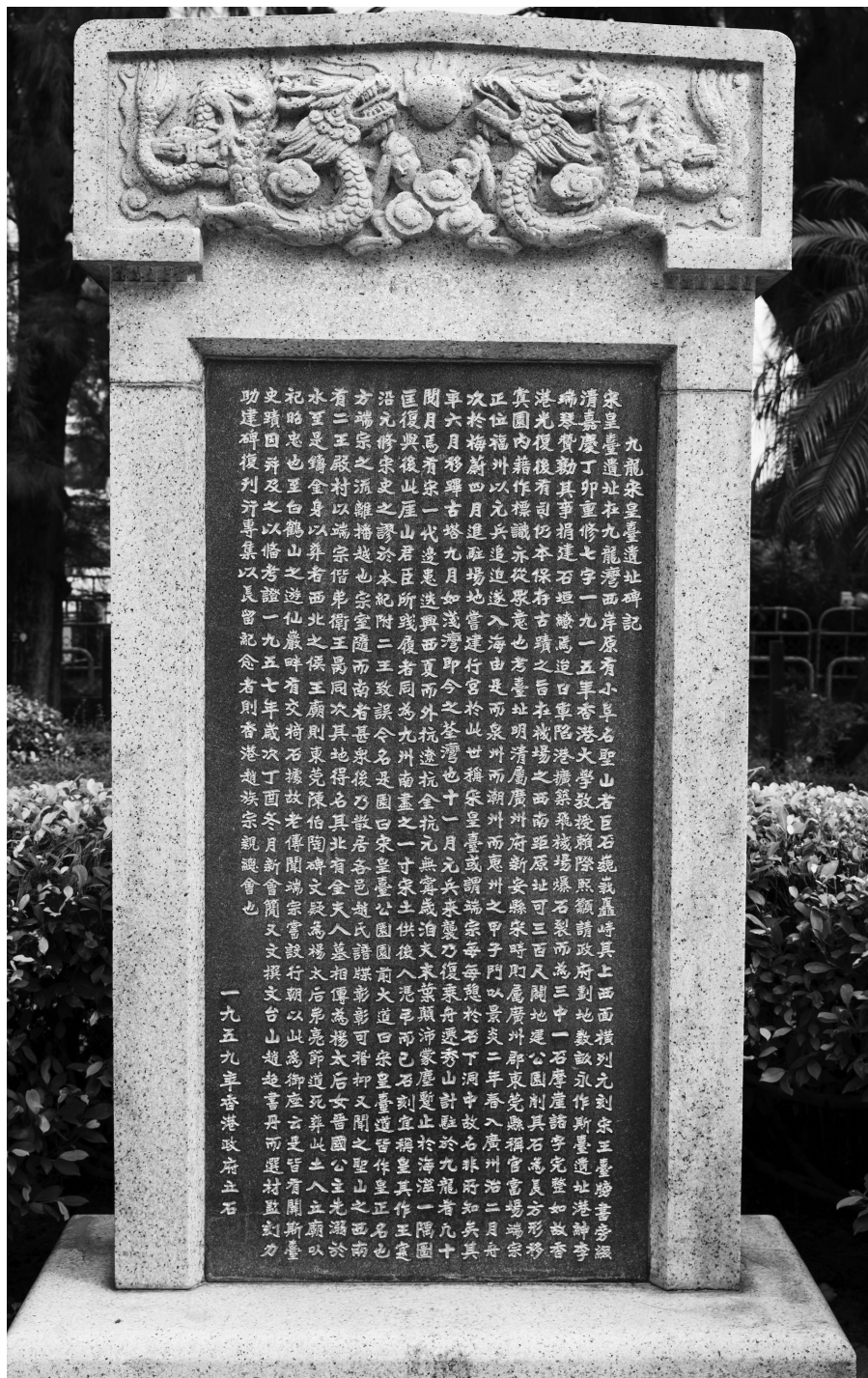


圖5：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

(資料來源：同圖3。)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及報刊

香港政府文件：

Broadbent, R. "Ministry of Civil Aviation Survey Report, Aerodrome Development at HK (Kai Tak) Airport." June 1951.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Project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Kai Tak Airport 1953." 1953 (387.7362 PRO).

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

"Correspondences regarding the Sung Wong Toi Garden, 1957." HKRS 177 DS 1-9.

"Sung Wong Toi (The Hill of the King of Sung) Kowloon City." HKRS 410-10-3.

"Sung Wong Toi Garden, Kowloon, 1956–1964." HKRS 156 DS-1-4457.

引用報刊：

《大公報》，1955、1959年。

《工商日報》，1956年、1969年。

《工商晚報》，1951年、1955年、1956年。

《天光報》，1932年。

《文匯報》，1997年。

《南華日報》，1940年。

《星島日報》，1941年。

《香港作家報》，1997年。

《華僑日報》，1955年、1959年、1961年、1964年、1969年。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8.

二、專書

方寬烈編：《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王夫之著，伊力編：《資治通鑒之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

朱少璋主編：《沈燕謀日記節鈔及其他》，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

孫立川校補：《新安縣志》第6冊，第18卷，嘉慶己卯鐫、鳳岡書院藏版，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

梁寒操先生治喪委員會：《梁寒操先生紀念集》，臺北：梁寒操先生遺著編纂委員會，1976年。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二卷——汐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郭沫若全集：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

陳君葆著，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著，曾景安譯，趙佐榮編：《葛量洪回憶錄》，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年。

鄒穎文編：《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 鄭思肖：《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年。
- 羅永生：《思想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年。
- 蘇光文：《抗戰詩歌史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 蘇澤東編：《宋臺秋唱》，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1。
- Butler, Chris. *Henri Lefebvre: Spatial Politics, Everyday Lif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 Grantham, Alexander.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2.
- Roberts, Priscilla,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tanek, Lukas.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三、論文

- 方寬烈：〈一部記述香港淪陷時期的詩作〉，《文學研究》2007年冬之卷第8期，2007年12月，頁64–84。
- 韋秀程：〈郭沫若佚詩一首〉，《郭沫若學刊》1988年第3期，頁57。
- 容啟聰：〈綜論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識難民〉，《台灣人權學刊》第6卷第1期，2021年6月，頁87–94。
- 陳學然、張志翔：〈冷戰時期香港「教育條例」修訂與私立專上院校發展(1948–1958)〉，《思與言》第57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35–98。
- 陳學然：〈時與變：戰後香港的私專教育事業〉，收入李帆、黃兆強、區志堅主編：《重訪錢穆》（下），臺北，秀威資訊，2021年，頁153–80。
- 趙綺娜：〈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歐美研究》第27卷第2期，1997年，頁65–108。
- 姚道生、黃展樑：〈空留古廟號侯王：論九龍城宋季古蹟的記憶及侯王廟記憶的歷史化〉，《思與言》第55卷第2期，2017年6月，頁17–69。

- Boholm, Asa. "Reinvented Histories: Medieval Roma as Memorial Landscapes." *Ecumene* 4.3 (1997): 247–72.
- Hon, Tze-ki. "A Rock, a Text, and a Tablet: Making of the Song Emperor's Terrace as a *Lieu de Mémoire*." In Marc Andre Matten ed.,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Leiden: Brill, 2011, pp. 133–65.
- Luthar, Oto. "Monuments, Mediatisation and Memory Politics: The Slovenian Post-Socialist Memorial Landscape in Transit." In Marusa Pusnik and Oto Luthar eds., *The Media of Memory*. Leiden: Brill, 2020, pp. 25–41.
- Mark, Chi-kwan. "A Reward for Good Behavior in the Cold War: Bargaining over the Defense of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2.4 (2000): 837–61.
- Owen J, Dwyer, and Derek H. Alderman. "Memorial Landscapes: Analytic Questions and Metaphors." *Geo Journal* 73.3 (2008): 165–78.

四、網絡資料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中國歷史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網址：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nse_subject_framework_chinese_history.pdf（讀取日期：2022年9月27日）。
- 香港公共圖書館，網址：<https://mmis.hkpl.gov.hk/zh/photo-collection>（讀取日期：2022年9月27日）。
- 百度百科「龍壁懷古」條目，網址：<https://baike.baidu.hk/item/%E9%BE%8D%E5%A3%81%E6%87%B7%E5%8F%A4/20305765>（讀取日期：2022年10月9日）。

宋王臺文化景觀與香港的歷史記憶流變

(提要)

韓子奇 陳學然

對香港居民或訪港旅客而言，位於九龍灣畔的「宋王臺」是一座著名文化景觀。但很多人不了解，「宋王臺」其實包含了兩個不盡相同的回憶系統：「宋王臺石刻」和「宋皇臺公園」。儘管兩者都與抵抗蒙古、保衛宋室的歷史有關，但兩者的時代背景與文化內容都有分別。扼要來說，「宋王臺石刻」是1911年後清朝遺老和南來文人雅士緬懷文化歷史、追尋身份意識以至建立精神價值的思想場域。而「宋皇臺公園」則是1950年代香港政府聯同趙族宗親總會一起建立的「冷戰下香港」的文化符號，一方面鼓勵市民(尤其是難民)努力工作，找尋新路；另一方面順應冷戰的二元對立局面，把香港納入西方陣營，建立「東方的柏林」的新形象。本文比較這兩種回憶系統的異同，並將集中以下兩點：第一，溯尋「宋王臺」如何由一塊巨石變成文化景觀；第二，探討歷史記憶如何構成共享空間，時局的轉變如何影響記憶系統與文化景觀的功能轉變。藉着上述討論，我們發現，前清遺民圍繞「宋王臺」所抒發的故國黍離悲思、憂時感國、忠臣死節、守護正統、不屈不撓的悲烈抗爭精神，成為了一種標誌，被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人所召喚和紀念，藉以塑造自身的政治或文化立場，建構身份認同。到了冷戰期間，因地緣政治與香港社會的變化，前清遺老抵抗蒙古、保衛宋室的抗爭精神，在冷戰下的二元對立格局中得以投射。而遺老的憂時感國、忠臣死節精神，則通過傳統中國花園的面貌，時刻向來往於此的人們訴說抗爭精神的當代意義。總的來說，從「宋王臺石刻」到「宋皇臺公園」的變化，向人們展示了二十世紀香港歷史的複雜性、多元性和多變性。

關鍵詞： 宋王臺 文化景觀 歷史記憶 前清遺老 冷戰香港

The Development of Sung Wong Toi as a Cultural Landscape and a Place of Memory in Hong Kong

(Abstract)

HON Tze-ki CHAN Hok-yin

To many visitors to Hong Kong, Sung Wong Toi (or Song Emperor's Terrace) is a tourist spot located in Kowloon City. But for many locals, particularly the sensitive souls, it has been a potent symbol to evoke a collective memory, a unique identity, and above all,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Based on Henri Lefebvre's threefold meaning of space—the perceived, the conceived, and the lived—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lex process through which a barren rock on the Sacred Hill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centrepiece of a locale where the Qing loyalists remembered the “benevolent rule” of the Manchu dynasty, a “place of memory” to celebrate Chinese nationalism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 splendid Chinese garden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at the high noon of the Cold War. By tracing the intricate steps and strategies by which Sung Wong Toi was repeatedly constructed as a spatial signifier, this paper shows the variety of forces that had shaped the politics and society of Hong Kong between 1911 and 1997. As Sung Wong Toi today becomes the name of a metro station in Hong Kong, we should reflect on its past and ponder its future role in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of Hong Kong people.

Keywords: Sung Wong Toi cultural landscape historical memory Qing loyalists
Cold War Hong Kong